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7月刊

总第71期



P54 名家论坛：

顾明远：学习不能讲竞争

教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及其重大意义
周洪宇

院长视点

- 21 加强法治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筑牢基石
- 37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名家论坛

- 54 学习不能讲竞争
顾明远

专家观点

- 58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中国昌
- 74 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在“术”更在于“道”
陈丽
- 79 从“3C”走向“3I”：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纵深发展
杨宗凯

院内动态

- 89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
- 91 我院院长周洪宇出席“乡村振兴和教育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欢迎与我们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及其重大意义

来源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情系教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领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着力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提升全体人民的教育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持续探索教育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立足于历史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全局，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经验，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教育支撑，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重要论述本身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教育之问”，构建了包含方法论、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的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并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新征程中不断发展。

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贯彻落实和体现，是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引领和思想旗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教育作为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支撑，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事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党优良教育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的本质特征、方针方向、战略保证、功能目标、发展规律、根本任务、育人模式、动力保障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和阐释。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教育工作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多次深入教育一线考察教育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走进校园考察都会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看待教育、谋划教育、发展教育。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各种场合对教育工作作出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体现了深切的教育情怀和对教育实践的高度关注。教育实践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活动，这种物质性活动是教育理论创新的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理论创新，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推动教育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推动下，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中国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新的教育实践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对中国教育实践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作出解答，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其实践根基是作为国家发展全局部分的教育事业发展实际，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理论创造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重大发展，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入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其在教育领域的理论创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回答了教育的时代之问，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坚持守正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成为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总要求，明确“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总定位，明确“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任务；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九个坚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新论断，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等新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新方法论；在202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对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根本任务、根本目标、重要使命、基本路径、核心功能、最终目标作出系统性论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继承性、连续性和发展性，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继承了毛泽东教育思想、邓小平教育理论等党领导教育事业发展所形成的理论，并在实

践中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理念、教育观点和教育思想的不竭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抓早抓小、久久为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实际解答教育问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用“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来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育话语体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苏维埃时期的教育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提高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为赢得土地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政策，大力推进正规化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当时的教育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毛泽东教育思想、邓小平教育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培养了大批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展教育事业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如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视教育内外部关系等，持续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引领着中国教育走向“强国时代”。

二、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上包含方法论、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内容包含“六个必须坚持”“九个坚持”“十一方面部署”等一系列教育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一个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理、道理、学理作出的新阐释，也是指导中国教育事业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论。

“人民至上”原则意味着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应与人民的需求和利益相一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民满意为旨归。“自信自立”原则在教育领域意味着中国教育应该扎根中国大地，既要保持中国特色、民族特征，又要兼容并蓄，积极汲取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独立解决中国问题。“守正创新”意味着对教育的追求必然是持续的、独特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既不能失其根本，又要对新的环境作出反应。“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重要原则，是对教育问题的解答，是推进教育研究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法门。“系统观念”强调，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既要深入教育内部，又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这是对“坚持问题导向”的补充和发展，意味着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复杂相互关

系的。在教育领域“坚持胸怀天下”意味着要有全球视野，鼓励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更广泛的教育问题和人类的共同问题，加强与国际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表明，在哲学层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观层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立场和群众史观，在认识论层面要坚持实践本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背后的教理、学理、道理进行总结提炼，对现有教育范畴、教育命题进行审视、反思、提炼、扩容、升华，对教育理论进行范围拓宽、主题拓展、内涵扩充，丰富和发展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功能观、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论等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说服力、穿透力和影响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四为服务”方针，这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由此，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的“九个坚持”。

“九个坚持”的出场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核心要义已经形成，标志着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生成。“九个坚持”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育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保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为其明确了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表明了其根本战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表明了其根本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反映了其根本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其根本价值追求；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为其提供了根本动力；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明晰了其根本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为其提供了根本依靠。“九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九个根本”，深刻阐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理论大厦的“四梁八柱”。

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变革性实践，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提出了十一个方面的战略部署，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十一方面部署”是在深入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本质特征、总体任务和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的战略部署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重大命题。“中国道路”这一概念意味着动态中的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发展的统领性概括，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十一方面部署”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系统方案。其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揭示了尊重教育内外部规律的重要性，是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生成重要举措；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战略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实现教育发展战略任务的重要保障；推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体现了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追

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底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教育数字化是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路径，“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重要法宝。

三、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已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若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结构，有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和基本主张，概括出了教育中的基本规律，能够解决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包括教育自身的问题和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关系的问题，便具有思想体系的性质和特征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一个理论命题群，拥有一套自己的思想要素、概念范畴与理论主张，涉及一系列教育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回答，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理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系统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特征。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与主线

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体系得以生成的开端，是理论体系的原点范畴，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引出的逻辑主线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线索，通过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得以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入分析大变革时代教育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着“办

教育”“培养人”两大主线思考解答“教育之问”，实际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育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生成发展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命题均围绕育人而提出。具体来说，育人就是培养新人、培养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是人民，力量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教育事业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守教育的人民立场，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美好生活，突出了教育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过程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以育人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始终沿着“办教育”和“培养人”两条逻辑主线思考解答教育问题。总的来说，在“办教育”层面，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根本道路，提出“十一方面部署”等实践要求；在“培养人”层面，围绕教育的根本问题，提出“九个坚持”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马克思主义深刻论述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但由于时代原因而未曾考察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则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作用，就教育的地位、作用和要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和系统谋划。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使“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后继有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人才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范畴

基本范畴是构成思想的基础要素，是对事物一般内涵和属性的抽象与概括，能够反映思想的主要论域和范围。之所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已经具备完整的体系，就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一系列基本范畴，围绕这些基本范畴形成了基本命题和主张，能够系统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复杂的现象和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领导”“立德”“树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改革”“创新”“教师”“人才”等基本范畴，全面论述了教育内外部系统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些基本范畴的关联和组合，构建起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以“教师”这一范畴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教师，指出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认为“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并对教师提出做“四有”好老师、成为“大先生”的要求，寄语教师学习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更重要的是，“教师”这一范畴同“人才”“立德”“树人”等其他范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演生出了一系列教育新思想。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范畴，是我们更加全面、辩证看待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重要途径。

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命题

基本范畴和命题构成了思想体系的核心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学理性和严密性。基本命题反映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结构、逻辑和深度，是系统地表达和理解复杂教育概念、现象或问题的载体。“九个坚持”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的基本范畴和命题。“九个坚持”意涵深刻，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又相辅相成，创新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聚焦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的命题。

“九个坚持”核心要义从理论上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方针方向、战略保证、功能目标、发展规律、根本任务、育人模式、动力保障等进行了全方位论述和阐释。“九个坚持”同“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既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回答了教育的根本问题，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方向、方针和原则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主张

人民至上的立场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立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置于段首，将其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育人这一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提出“九个坚持”，为全面深入理解教育内外部规律确定了基本原则。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概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教育发展作出了“十一方面部署”，系统谋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整体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系统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逐步形成了包含“十一方面部署”等一系列教育新观点新论断在内的基本主张。这些基本主张着力于解决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致力于建设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聚焦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教育使命。“十一方面部署”与“九个坚持”一起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内在贯通、有机统一，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形成了包含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主张等在内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完整思想体系。

四、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深刻强调，理论思维作为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就体现在，它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与客观现实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体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是指导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活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直面时代的教育问题，形成了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教育观点与主张的开放性教育理论体系。这个开放性的教育理论体系概括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将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源于实践、不断展开的理论体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始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是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既顺应了时代的呼唤，也是教育实践的产物，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并引领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在实践中不断展开、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多次深入学校一线考察并同师生座谈，多次就重要教育议题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基于实践、在实践中、为了实践提出教育论述，回答教育问题，用鲜活丰富的中国教育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源于实践、不断展开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飞跃。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开放式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品格，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开放性一方面体现在理论自身的开放，即在开放中不断更新发展，在开放中博采众长，在开放中实现对理论的超越；另一方面体现在理论面向的开放，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而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它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自身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教育实践，推进理论创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方针，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此外，其开放性还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实践经验的发展和反思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坚持从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实践中汲取经验，充分发挥“两个结合”在教育理论创新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断与时俱进。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不仅扎根于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而且广泛吸纳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将人类文明中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是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根本遵循，并随着未来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教育对外开放等战略部署，就是要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谋求教育现代化。

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也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发展的新情况与时俱进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与时代共同发展的开放式理论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

科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且能服务实践、引领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我国教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关注和解答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中，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源源不断地形成关于教育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不断谱写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对人民教育期待的不断回应、对教育实践的持续关注造就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其具有持久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目前，我们正

处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这将推动教育实践迈向新的阶段，在更高水平上发展。随着教育实践在新的层次上展开，教育理论也必然会随之进入新阶段，这就是与时俱进的意味。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将不断推进教育事业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其开放性特质。

五、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进程中实现了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文化意义和世界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科学指明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自信”，为更好发挥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同时，教育是文化的主要领域，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结论、现实的必然，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警惕有些人“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中国的教育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飞跃与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理论魄力和理论视野，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根本立场和核心观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科学方法，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思想构成来看，教育并非“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之一，但“十个明确”中的任何一项都与教育有着紧密关联，“十四个坚持”中的任何一项也与教育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当代中国正进行着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推动着教育改革创新及其现代化，迫切呼唤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坚持守正创新，是不断发展的开放式的理论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中国教育事业取得辉

煌成就，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教育公平取得新成效，教育质量有效提升，教育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教师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教育对外开放呈现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以往教育实践经验和成就的系统总结，具有巨大的实践总结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在空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做好教育工作的行动纲领。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教育使命感、责任感，保持战略定力，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是对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关系的重大论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举措，能够发挥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新了我们党对教育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能够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贡献强大教育、科技、人才力量的思想来源。

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原创性地贡献了有益于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传承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教育支撑。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为新时代加强“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教育样板。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奠定了心理基石。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抛弃的精神家园，如果它被遗弃了，就会切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蕴含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将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品位注入教育，坚定了人民的文化自信。

5.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不仅指引了中国教育，也为世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中国教育贡献，提供了中国教育方案，贡献了中国教育智慧。

首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教育贡献。战胜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应该顺此大势，通过更加密切的互动交流”“确立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不仅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思想指南，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了中国教育贡献。

其次，为促进人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教育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指引着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为与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后发国家探索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教育理论体系，并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促进人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教育方案。

最后，为解决人类教育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教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对“人类教育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让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焕发蓬勃生机，成为创新性解决人类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中国智慧。

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既有教育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与发展，明确了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表明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已经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坚实基础和立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在实践中不断展开、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我们应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统一思想和行动，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新成就。





加强法治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筑牢基石

来源 | 《现代教育管理》2024年05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其核心要义在于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面深化三大领域的改革，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化三大领域改革的基础则在于加强法治建设。系统集成的法治建设应为三大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夯基垒台，为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立柱架梁，确保党和国家的新制度、新举措能够在法治框架内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以系统完善、协调一致、权利与义务平衡、要点明确突出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基础，打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部门和公平正义、高效权威的司法机关，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筑牢基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法治规律，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

实践相结合，把良法善治的要求贯穿于教育改革、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要聚焦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问题，以及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整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法治建设。

一、统筹推进教育法治建设，优先加快教育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法治建设之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满足人民群众对享有高质量教育的愿望，以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受教育权为核心，强化国家、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主体责任，为国家兴盛、民安物阜奠定教育基础。教育是强国之基、兴国之要、民生之本，在国家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加快教育法治建设，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和合法权益为方向，以推动社会发展的高质量教育改革和建设为目标，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民主立法的基本要求，以具体、明确、科学的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分配为方法，富有实效地解决教育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一）加快编纂教育法典，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从我国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外教育法典的编纂经验，将编纂教育法典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下，组织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牵头启动教育法典编纂研究编写工作，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完成教育法典编纂工作，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教育法典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由立法机关通过科学合理的、富有逻辑的和内在一致性的体系来整合教育法律部门全部内容的基础性法律。教育法典作为教育法律体系的完整表达，其立法宗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吸收、提取其他教育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宗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规范教育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明确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体系。教育法典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国家人民。坚持人民立场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国家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的显著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法典作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体系，应紧紧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教的全过程中。

从教育法典的内涵来看：第一，教育法典应具有体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经为我国法典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一定体例编排的法律汇编已不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法典编纂模式。教育法典的编纂，应突破处理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的单行法的限制，通盘地、全面地构建教育法治体系；为了避免结构复杂、规范重复、规则矛盾、价值冲突的可能出现，应从概念、规范、制度、价值等层面构建形式和实质一致的教育法体系。第二，教育法典在体系上应具有科学性、规范性、严谨性。教育法典应以严密且精确的语言构建起彼此关联的概念体系，以周密地安排处理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法律与其他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第三，教育法典在内容上应具有完备性。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吸收现行全部的教育法律法规，覆盖中国教育制度的各个方面；教育法典的外延则应包括调整教育法律关系的、现行有效的全部法律规范，以及正在制定、编纂过程中的有关学前教育、终身学习、托育服务、老年教育等法律法规。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法律虽有密切的联系，但上述法律调整的主要是法律关系而非教育法律关系，可以参考知识产权法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在教育法典中为上述法律留下开放性、灵活性的制度空间。

法与时转则治。一方面，教育法典的制定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经验和国外立法的成果，可采用总分结构作为我国教育法典的基本结构框架。教育法典大致可分为十一编包括：总则、家庭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民办教育、终身学习、教师及学位。总则可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教育法律体系中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法律规范提取出来作为其主体内容。具体来看，总则应包含立法依据、目的与宗旨、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内容，并吸纳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行政权力、教育机构等法律规范，建立一套围绕受教育者权利与义务、国家权力与责任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教育法典的编纂要防止体系化、法典化带来的制度僵化。教育法典化只是教育法律部门体系化进入高级阶段的起点，而非终点。对于教育法典的编纂而言，教育法典应在体系化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灵活的、开放的制度留白，不断吸取实践经验，保证教育法律体系新旧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同时也为教育现代化的总体实现留下自我调适、改革创新的动力与空间。

（二）抓紧研究制定托育服务法，妥善解决“幼有所托”的重大民生问题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而“幼有所托”是关系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民生议题。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对于缓解劳动者工作与家庭冲突，提升劳动者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问题。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明确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为配套支持措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规范托育服务。从婴幼儿托育行业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实践来看，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对托育服务的制度保障、福利补贴、运营模式、师资队伍等进行了有益探

索，如美国颁布了《儿童保育法》，日本颁布了《关于推进综合的学前儿童教育、保育服务的法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相关部门和机构，抓紧研究制定托育服务法，使法治建设服务于党的重大决策，使重大改革、重大决策于法有据、依法实施，将长期以来党领导人民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方面的创新理念、改革成果、实践经验转化为法律，以法治框架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对子女的照料、消除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制约生育的主要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新时代人口工作行稳致远，保障人口发展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统筹推进城乡托育服务体系，明确政府发展托育服务的责任，强化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职能。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托育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区域内常住人口和需求配置托育服务设施，确保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和机构，满足辖区的托育服务需求。二是确保对托育服务的财政投入，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经费支持机制，综合运用土地、住房、财政、投资、融资、人才等支持政策，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高托育服务质量。三是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对托育服务的综合监督管理，如简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的办理指南，加强信息共享和监管协作，为托育机构的设立、登记、备案等提供指导和服务，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信息公示制度、评估制度，加强对托育机构服务质量、建筑安全、收费管理、动态管理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四是加强学前特殊教育资源建设，确保有特殊需要的学龄前儿童获得相应的教育与托育服务，满足家庭的多样化托育需求。五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托育服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加强对保教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明确保教人员的资质资格要求，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保证婴幼儿接受安全、优质的照顾和教育。要完善托育教师培养体系，采取前移培养起点、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培养课程体系等方式，突出保教融合，加强儿童发展类、保育教育实践类课程的建设，提高保教人员培养的专业化水平。

优化托育营商环境，明确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要素流动自主有序、要素配置高效公平的原则，推动公平竞争。一是确立公办和民办托育机构具有同等重要

的地位，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为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提供者创造平等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条件。政府应对民办托育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和经费补助，确保其托育服务质量。二是明确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允许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根据市场供需、服务质量和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托育服务收费标准。三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托育服务领域，支持各类托育机构依法自主经营、自主确定服务内容和方式，促进人才、资本和资源在托育服务领域的自主有序流动。四是对有特殊需要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婴幼儿，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补助，保障他们接受托育服务的权利。五是加强政策法规的系统集成，对新出台的举措、新制定的制度开展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政策制度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三）研究制定老年教育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峻，“未富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产生全面而深远影响，特别是老年人对精神文化和学习需求增长较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形势和任务更加紧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国需要积极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趋势，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老年教育内涵发展，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能力；坚持社会多方参与，提升老年教育发展的社会活力；倡导“在学习中养老”的理念，提升老年教育和老年人学习的品质，让更多老年人享受高质量教育服务，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与幸福指数。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出台了终身教育、老年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将老年教育政策作为重要的社会政策。为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借鉴国内外终身教育、老年教育领域立法的经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老年教育法增补进“十四五”立法规划或者2025年立法计划项目中。

长期以来，老年教育都是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的重要领域，且已经形成了政府

主导、多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立法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实践为基础，以党的领导、以人为本、按需施教、协同育人为原则，把握好统筹性、公益性、普惠性的内涵式发展需要，为老年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老年教育立法必须从老年人根本利益出发，遵循老年教育规律，努力保障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老年教育立法必须为全社会共同参与老年教育提供法治基础，以稳定、完善的法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建立覆盖广泛、社会参与、资源融通、灵活多样、优质均衡、充满活力的现代老年教育体系打牢地基。

明确各级政府在老年教育中的主导责任。各级政府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加大投入、统筹利用公共资源、鼓励社会参与及支持教育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式，确保老年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建立和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国务院应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工作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国家范围内的老年教育工作。其他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二是将老年教育纳入发展规划，并加大财政投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教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健全管理和服务体系，完善各项政策和保障措施，并对开展老年教育活动的机构，按照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税收优惠、经费补助、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支持。三是统筹利用公共服务资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统筹利用本行政区域内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举办老年教育，鼓励和支持金融、卫生等行业系统参与老年教育，夯实办学基础，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支持服务体系。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老年教育。老年教育立法应积极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机构服务老年教育，及时将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稳定的法律制度。一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老年教育机构，并对这些机构在租赁、使用国有资产，享受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二是鼓励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结合自身特点，参与老年教育，开设与老年教育相关的专业，培养老年教育专业人才。三是鼓励退休人员、符合条件的教师及科技、医疗、体育等专业人员到老年教育机构兼职任教、开设讲座，并可以依法获取报酬。四是鼓励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教育场所向老年

教育机构开展老年教育活动时免费或者优惠开放。五是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及志愿者依法为老年教育提供服务，丰富老年教育内容和形式，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升其生活质量。六是建立健全社区老年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社区教育机构、职业教育中心等公益性教育平台，开展老年教育活动。七是支持老年教育机构建设老年教育线上学习平台，开展远程教学活动，使老年教育资源能够更广泛地被共享和利用。

明确老年受教育者权利的救济途径和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国家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老年教育机构进行登记、备案，并对其宣传、招生、收费等运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按照本条例履行职责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主管部门、任免机关、单位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教育机构或其他市场主体侵犯老年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研究制定终身学习促进法，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夯实法治基础

20世纪60年代，自国外学者提出“终身教育”以来，“终身教育”就成为世界主流教育思潮之一。随着“终身学习”理论的兴起，“终身教育”逐渐向“终身学习”转换。21世纪以来，世界教育正在从“终身教育”向“促进终身学习”演进。一个人的学习很难由一次性学历学位教育全部完成。从正规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技能，未来生涯中往往只有15%~30%可以始终有用，大量知识技能是在此后工作中不断习得的，因此，促进每个人的终身学习成为当务之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建设适合我国基本国情、更具包容性的学习型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借鉴国外终身学习立法的经验，将研究制定终身学习促进法增补进“十四五”立法规划中。

我国终身学习立法以保障公民的终身学习权利为目标，以终身学习原则沟通与衔接各级各类教育，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提供体制、机制、制度和资源保障。可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表述，即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具有平等地位，它们享有同等发展权和被认可权；明确保障除正规学校以外其他教育和学习形式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平等参与各类教育成果、质量工程、技能竞赛、学术研究、专业发展等项目的申报，平等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等。终身学习促进法大致分为八章，包括总则、学习者的权利、教育提供者的义务、政府对学习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学习者组织、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和附则。终身学习促进法框架鲜明展示了立法的宗旨，通过对学习权的保障制度，引领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

终身教育促进法应明确立德树人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与制度，明确公民享有的具体学习权利和义务，明确界定教育提供者的范围，明确政府担负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与完善、建立终身学习制度的主体责任，明确公民享有学习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明确学校在促进终身学习中的责任，建立健全终身学习经费保障机制，明确权利的救济途径和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二、完善中国特色科技法律体系，以专项立法助力新兴技术重点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科技立法立规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基本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制科技研究开发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保护科技成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普及科技知识等旨在促进和保障科学技术进步的彼此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的科技法律体系。展望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以法治巩固科技发展和制度改革成果，以高质量的专项立法助力科技创新的重点突破，以

高效稳定有序的执法、司法和宣传提升社会的创新法治意识，积极回应党和国家对科技高效有序发展、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法治期待，积极回应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市场主体对科创领域基础性问题 and 灵活性安排的法治期待，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科学共同体对科技发展的伦理底线、创新范式的法治期待，积极回应下一代面对科技前沿、国际竞争、生命财产安全的法治期待。

科技法治建设之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领导，以全面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通过科技法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提升体系化能力和重点突破能力，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一）启动研究制定科技伦理法，促进科技在法治的轨道上高水平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迅猛发展，科技力量不断集聚壮大，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创新取得重要突破，随之而来的科技伦理挑战也日益增多。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是风险的源头。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任务。建议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主导作用，牵头组织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部等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及高校等，启动研究制定科技伦理法。

明确科技伦理立法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我国科技伦理立法起步较晚，呈现出领域分散、内容抽象等现象，且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如何把握好科技伦理法的适用领域范围、逻辑主线，需要及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专项法规及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领域的地方立法中学习，提炼出科技伦理审查中的痛点、

难点问题，如科技伦理的义务与责任归属，科技伦理中的底线，科技伦理审查的要求及有效性，科技伦理审查的评估方式等，是在中央层面着力研究科技伦理立法的重要问题。

明确科技伦理法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指出，开展科技活动应遵循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科技伦理原则。科技部等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就科技伦理审查提出科学、独立、公正、透明的原则。国际社会为积极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也制定了一系列公约或法案，如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法国《生命伦理法》等。这些公约和法案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发展必须坚守的伦理底线，包括尊重人类尊严、保护个人福祉、防止任何歧视等。

聚焦科技伦理的重点领域，提高违法惩处力度。近年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颠覆式创新不断涌现，颠覆性的新成果、新技术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科技伦理和安全风险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科技伦理立法必须聚焦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涉及人类尊严和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领域，及时推动将重要的科技伦理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并加大监管、提高惩罚力度。

把握研究科技伦理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研究科技伦理法的可行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在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三大重点领域实现专项立法研究和突破，及时预防和控制伦理风险；二是充分发挥地方立法“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先行探索一般科技伦理的总体规律和特定科技伦理的具体规律，为规模更大、成本更高、时间更久的中央立法探索科技伦理的基本规律，并及时积累经验；三是加强科技伦理立法研究工作，坚持将一般与特殊、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社会团体、科技人员等不同主体的研究优势，围绕科技伦理立法的基础理论与具体规则、一般规律与重点领域、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国内外实践等方面展开立法研究工作。

（二）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统筹设计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目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生活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也将改变社会经济、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经济乃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变量。因此，中国、美国、欧盟都启动了对人工智能的立法程序。2021年4月，欧盟公布了《人工智能法案》，2023年12月，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协议；2023年9月，美国发布了人工智能立法框架；2023年7月，我国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推进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启动对人工智能的立法研究，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统筹设计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明确中国人工智能法案的目标，深入研究法律应当维护的价值底线，不同法律规则实现目标的能效，以积极回应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新问题，是人工智能发展必须积极面对的新挑战。人工智能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立法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守住伦理和安全底线，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以科学、民主的方式界定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明确立法目标、提出治理方案、评估方案可执行性，积极回应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科技发展伦理底线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工作机会问题，积极回应产业链关心的权利分配、风险分担和责任承担问题，积极回应人工智能发展必须面对的资源统筹分配、提高科技发展能效问题、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参与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交流人工智能领域的法治原则与重点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点问题，以及各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策略，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制定，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2023年，美国参众两院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议案和制度框架，规制人工智能的发展。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

则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分歧加剧等基本问题，以及数据滥用、虚假信息传播、隐私泄露、知识产权侵犯以及攻击性用途等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规范，从语料来源管理、语料内容过滤、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监督抽检等多个方面建立了人工智能公司的合规义务，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设定了清晰的监管要求，以有效保障用户的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

（三）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立法，探索为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立法

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是关键战略资源的竞争、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关键尖端人才的竞争、关键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竞争和关键安全事项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发达国家已经在科学技术的关键领域进行了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目标，以实践问题和需要为导向，以统筹安排规划为内容，以国家安全为底线的立法，如美国的《通过利用风险披露技术增强和提高网络能力法》《芯片与科学法案》《核能创新与现代化法》《信息技术现代化卓越中心计划法》等，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牵头组织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启动研究制定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专项立法，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促进与规范、统筹规划与公平竞争、支持与平等的关系，促进科学技术的有序高效发展，为科技强国的建设铸牢法治基石。

数据是 21 世纪的“石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已经快速融入社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自 2014 年，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到 2022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再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公布，提出“数据二十条”，大数据相关政策频繁出台，已然形成了数据基础制度的“四梁八柱”。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牵头组织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及高校，启动大数据领域研究立法，为数据的生产、流通、安全、治理等问题奠定法治基础，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云计算技术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应用和推广，已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产业。从云计算的技术特征来看，它是一种将数据处理任务上传到网络进行分布式存储和分解计算的网络技术。该技术使数据可以打破本地储存处理的限制，对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储存和处理。但是数据在公开的网络云之中流转，任意的网络节点都可能受到网络攻击。这就意味着，便利、高效的技术伴随着公民个人身份信息、敏感信息、商业秘密甚至国家秘密被泄露、盗用等高风险，而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无法有效的适用于云计算领域，大量的云计算技术行为和标准规范依然处于模糊的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牵头启动云计算领域的立法研究工作，兼顾对数据安全的“有效保护”和云计算技术的“合理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活力，是以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组织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及高校，启动研究制定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及时将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精准有效的政策制度上升为法律法规，如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完善科技金融工具，推动夯实人才领域法律基石，深化校企合作创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等。

三、夯实人才领域法治基石，营造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环境

人才法治建设之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积极营造尊重人才、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法治环境为目标，通过人才法治建设形成稳定且有利于聚集人才的引才机制、稳定且有利于人才成

长的培养机制、稳定且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稳定且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稳定且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一）修改、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相关制度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公安部、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修改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修改必须坚持主权平等原则，我国公民对我国国籍的放弃应当以其向我国政府作出申请、声明，并得到我国政府批准为必要。且在制定具体的出籍流程规范中，充分考虑以下事项：对作出放弃国籍、声明放弃国籍的个人年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规定；向我国政府申请放弃国籍者应当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申请放弃国籍者应已依法履行宪法定的公民义务，如服兵役等；申请放弃国籍者应声明并承诺将于放弃国籍内一定时间后移民并定居国外；等等。

把握好国籍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适应性，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基本原则，制定适应我国发展的出籍、复籍规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始终影响着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彻底解决该问题，我国始终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原则，并以多个双边条约的形式明确反对华侨具有双重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该法律的颁布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不承认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法律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安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基本原则，可以有效防止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过度猜测。同时，我们也应立足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灵活地处理对该原则的细化、解释等问题，研究设计维护国家利益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出籍、复籍制度，有助于我国建立与移民的互动，为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提供节点。

坚持科学立法，处理好对公民国籍权利的解构，防止超国民待遇的产生。在规范出籍、复籍制度时，必须解构好国籍权利，使部分已具有外国国籍但尚未出籍的公民，既能享受到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又能在中国投资、就业时得到特殊

照顾，且不必承担来回奔波办签证以及购房、就业、医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负担。更能享受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参加国家管理，担任公务员任职等）、具有集体身份（如人才身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利）等优待。

（二）启动研究制定移民相关法律法规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国家移民管理局、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共同启动研究制定移民相关法律法规。移民制度作为国家主权事项的重要内容，有必要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以此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国家对领土内的一切人与物享有管辖权，是一国主权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应对全球化深入发展、构建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应对特定类型的外国人在华居留和工作的问题。相较于一直享受着国际人才红利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暂时缺乏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很可能失去国际人才的新红利。有学者在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人才政策时发现：“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人才红利。在美国，三分之一的专利创造来自国外移民，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

制定移民相关法律法规是我国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高端人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正日益成为外国人才目的国和国际移民目的国。通过建立更加开放和透明的移民体系，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国际移民在华的人身、居住、财产等权利，明确国际移民的基本待遇、义务与责任，能更好地吸引国际人才和资本，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展现我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大国形象。我国已经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以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统一审批外国人永久居留和入籍申请，以及社保、档案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国家移民管理局研究制定移民法，为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移民监管、移民社会福利制度等相关政策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开辟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与教育治理现代化

来源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3 年 07 期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时代课题，需要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 OpenAI 公司发布了由 GPT-3.5 系列大模型微调而成的全新对话式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不到四个月，OpenAI 又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推出了 ChatGPT 的升级版——GPT-4。2023 年 3 月 16 日，我国百度公司正式发布了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文心一言”。当前，不断更迭的数字技术正加速着教育的数字转型与融合创新，尤其是以 ChatGPT、GPT-4、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了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的特征，使得人工智能在教育治理领域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置身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字技术之于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革命性影响。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的三重逻辑

教育治理是指政府协同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等行为主体，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时代挑战，达到好的治理效果。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因技术的嵌入而蕴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即数字技术被当作手段或工具应用于现有的教育治理领域，其引入的直接目的是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其二是“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即针对数字化教育问题进行的创新治理，其中不少问题是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实际上，“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往往离不开“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ChatGPT 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很强变革力、

重大推动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虽然目前我们仍致力于寻找释放 ChatGPT 治理潜能的安全路径，ChatGPT 技术本身也非完美无瑕，但借助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治理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的逻辑主要是从“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这一角度而言的，可以从价值逻辑、技术逻辑和现实逻辑三方面来把握。

（一）价值逻辑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既是教育制度完善、教育能力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精神建构、教育价值彰显的过程。古往今来，任何治理体系的选择、确立、运行和完善，都需要以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作为支撑。教育是一项以人为本的千古事业，教育治理区别于其他行业治理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治理的对象是人，治理目的也是人，即通过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质言之，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以先进性、科学性、人本性相统一的价值体系为指引。其一，先进性。ChatGPT 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具有广泛的适用场景，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处理。它的嵌入丰富了教育治理工具，赋予了教育治理机制扁平化、协同化、整体化的运行态势。其二，科学性。ChatGPT 有助于教育治理主体改变过去因数据封闭而导致的拍脑袋决策状况，推动其走向科学决策的新境界，尤其是为打破传统科层制的行政壁垒、促进跨部门的合作共享提供了新动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育治理精准度。其三，人本性。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强调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在我国，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就是要立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个体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进一步而言，就是要借助 ChatGPT 调整教育治理结构与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公平，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简言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首要价值是以人为本，指归是实现“善治”。

（二）技术逻辑

数字技术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工业变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勃然而兴，必然引发一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变革。特别是 ChatGPT、GPT-4、文心一言擅长人机交互，在语言理解、图片理解、文字生成、计算机编程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为优化教育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

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的技术逻辑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于宏观层面而言，ChatGPT 会影响全球教育治理及国家教育治理，会对政府层面的元治理和社会层面的多元共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ChatGPT 可以推动政府建立健全治理制度，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教育治理。于中观层面而言，ChatGPT 为学校治理注入了新活力，有助于进一步保障落实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权，会在很大程度上革新学校自治。于微观层面而言，ChatGPT 可以赋能班级治理创新。当前教育治理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对教育内部治理的重要的群体——学生关注得不够，未能深入到更为微观但也更为重要的班级（课堂）层面。ChatGPT 能够深刻影响班级的教与学，会对微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产生直接影响。

于本质而言，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一方面会推动教育治理场景的革新、重构，另一方面会通过教育的互动调适来完成技术的升级。技术嵌入是数字技术重塑教育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ChatGPT 的引入会使原有的教育治理生态体系发生局部变化甚至整体变革。体系重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技术嵌入后教育治理体系对其予以的“反馈”。技术嵌入并非“拿来式”地直接应用，还包括结合教育自身特殊性对 ChatGPT 的修正及完善，目的是使其应用更加切合教育实际。需要指出的是，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有可能引发各种“不适”问题，需要及时对其进行调适，这也是反向“建构”ChatGPT 的过程。调适是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地耦合，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推动教育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三）现实逻辑

社会技术变革加速是我们现在所处历史时期的特征，其表现包括正在进行的

数字革命，以及生物技术和神经科学的进步。技术创新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借助 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治理变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

首先，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紧密切合时代发展需要，及时更新现代化治理工具。ChatGPT 在教育治理中的嵌入，能够拓展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优化教育治理模式，提升教育系统运行活力，构建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方式科学、治理过程畅通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借助数字技术优化教育治理是世界教育强国提升教育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我国也非常重视数字技术之于教育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作用，从《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再到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无一不强调数字技术对于教育治理的重大作用。通过 ChatGPT 等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

最后，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也明确指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强调“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教育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借助 ChatGPT 等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真正做到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二、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之间的张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影响是错

综复杂的。虽然人工智能在技术层面是价值中立的，但考虑到教育治理的复杂性，以及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在实际应用时，我们需明确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与 ChatGPT 之间的张力，明晰 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 ChatGPT 自带的风险趋势进入教育治理场域

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意味着 ChatGPT 自带的风险也趋势进入教育治理场域。ChatGPT 给教育治理带来的直接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ChatGPT 会产生错误性信息。ChatGPT 给出的结果主要基于其训练数据的统计规律，而非像人类一样，是对复杂世界和抽象系统的真正理解。因此，该系统可能会产生不正确或误导性的信息，并可能产生攻击性或有偏见的内容。进言之，ChatGPT 作为一种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其最先的研发并非专门针对教育事业，也就难免带上了通用人工智能局限性的烙印。故此，针对一些特别专业的教育治理事宜，ChatGPT 不一定具有全面的了解，其生成的结果不一定完全可靠。

第二，ChatGPT 会带来新的数字伦理风险。一方面，ChatGPT 给出回答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技术黑箱”，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会进一步加剧教育治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使用数字技术，必然会产生公共数据、个体数据、研究数据及跨界数据等。无论是哪一类数据，都必然涉及数据流通，极易带来隐私安全问题。目前，OpenAI 公司并未就收集处理用户信息进行详细告知，其收集的用户基本信息将以何种方式删除也不得而知。用户的教育数据一旦被背后的运营商挖掘和操控，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第三，ChatGPT 在带来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教育评价层面的多重风险。具言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教育评价有可能沦为一种控制模式，引发技术至上崇拜；如若评价主体智能素养不高，则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还可能会导致数据主义泛滥，致使教育评价体系深陷于数据旋涡中。

第四，如若治理不当，恐将加剧教育数字鸿沟。ChatGPT 引入教育治理的目的是促进教育公平，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帮助贫困地区学子在数字化轨道上拥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因不同地区的师生、教育管理者掌握数字技术的能

力不对等，很容易产生新的教育数字鸿沟。进而言之，如若 Chat - GPT 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这势必影响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二）数据孤岛与治理壁垒阻碍 ChatGPT 发挥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但仍缺乏数据的深度整合与信息的有效集成。尤其是当前治理体系中的政府、学校、企业等部门，倾向于独自构建教育数据系统，系统之间缺失共享机制和统一接入标准，导致教育治理过程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治理壁垒，数据孤岛的现象还很突出。

数据孤岛和治理壁垒的现实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受过去条块分割管理模式的影响，在教育治理过程中仍存在“纵强横弱”的现象。纵向教育治理有着较强的系统性，但从横向来看，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仍存在断点。这也意味着 ChatGPT 进入教育治理领域，有可能出现应用不均衡的现象。二是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教育治理模式。ChatGPT 作为一种新技术，难免会受到原有治理机制的抵触与排挤。客观而言，当前数字教育治理仍处于初期阶段，在实际应用中远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甚至有部分教育管理者对数字技术存有抵触心理，他们不愿学习新技术，这也进一步增加了 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的阻力。当然，打通 ChatGPT 与传统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之间的隔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充分释放 ChatGPT 的技术潜力任重道远。

（三）现有教育治理框架难以应对 ChatGPT 带来的风险

教育治理体系可以被看成一个以教育治理规范为核心的系统工程，传统的教育治理主要侧重技术治理的实用价值，其与法治规范之间的潜在张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2019 年和 2021 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相继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针对 ChatGPT 引发的新一轮数字治理风险，现有的应用规范体系尚不成熟。

在教育治理领域，ChatGPT 的应用风险远远超出了当前治理框架的承受能力，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 ChatGPT 应用规范，在应用于教育治理时，使用者应当遵循何种伦理道德、何种行为规范并不明朗。其二，当前没有一套适用于 ChatGPT 的共享安全协议，没有完善的外部审核与监督机制，也就无法确保 ChatGPT 的使用是安全的、可靠的和稳健的。其三，现有的问责过程含糊不明。由于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社会技术结构和多方面的价值观以及实践的特殊性，针对人工智能的问责制定义是模糊的，适用于 ChatGPT 公开透明的问责制尚未建立，进一步加剧了 ChatGPT 给教育治理带来的风险。

正是基于现有治理框架难以应对巨型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考量，生命未来研究所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暂停巨型人工智能实验：一封公开信》（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公开信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具有人类水平智能的 AI 系统可能对人类带来极大的风险”，“没有人能理解、预测或是可靠地控制这些大模型，甚至是模型的创造者也不能”，“只有当我们确信 AI 大模型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风险是可控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三、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看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发展方向

ChatGPT 的问世，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里程碑，各种应用平台接入 ChatGPT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我们更须明白的是，ChatGPT 并非赋能教育治理的唯一数字技术，而且技术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现有 ChatGPT 崛地而起，日后还会有其他新型技术涌现。在探赜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发展方向之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要关注 ChatGPT 给教育治理带来的动能，也要兼顾其他数字技术给教育治理带来的机遇。

（一）教育治理科学化

由经验治理走向科学治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的必然选择。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科学化是指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遵循教育发展客观规律，辅之以数字技术来分析和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教育治理科学化的本质要求是

运用科学方法，保证教育治理结果正确。在 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政府能够及时进行治理理念更新和治理策略调整，推动教育治理更加科学。

教育决策科学化是教育治理科学化的核心环节，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教育决策由经验走向循证，保障教育决策有据可循。过去的教育治理决策通常是在抽样调研数据基础上，依据管理者自身经验而做出的，所以决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难以保证。在数字化时代，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深入挖掘教育数据背后潜在的价值信息，辅助政府优化教育决策。具言之，向 ChatGPT 提供教育决策的相关数据，并提出决策的预期目标和限定条件后，ChatGPT 可以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尤其是 GPT-4 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均超过了 ChatGPT，可以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决策。虽然 ChatGPT 因其回答的准确性问题而时被诟病，但其在信息加工处理方面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拓宽思路，为政策创新带来灵感。

（二）教育治理高效化

教育治理效能是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最佳的教育治理绩效，才说明教育治理现代化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数字化时代，提升教育治理效能要求提高教育治理过程的有效性以及治理目标的达成度。毋庸置疑，ChatGPT 等数字技术为高效化的教育治理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ChatGPT 在教育中的应用革新了治理工具，推动教育治理成本降低，加大教育治理产出，促进教育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ChatGPT 等数字技术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其一，通过与 ChatGPT 的互动，可以增强个体对教育决策的理解，促进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合作效率。其二，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教育管理者预测与感知教育治理风险，并为精准解决教育治理难题提供具体方案。其三，ChatGPT 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既能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管，又能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形成合力，助推监管体系完善，提升治理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教育治理的高效化容易被曲

解为只看最终结果是否实现目标、收益是否最大。实际上，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高效化并非片面、盲目地追求高效，而是兼顾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换言之，在关注教育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还要不断反思教育治理背后的深层次的立场与追求。

（三）教育治理民主化

教育治理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优质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教育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便是民主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亦是不断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过程。在数字化时代，民主更多地向微观领域渗透和扩散，使得民主更加真实。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教育决策自下而上成为可能，有助于让微观决策中人民自我服务成为现实，从而有效推动教育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从治理主体的视角来看，教育治理是一项多元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所有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都需要有合理表达的途径。ChatGPT 助力教育民主化不仅指向摆脱权力束缚、破除层级障碍，还表现在教育实践中为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治理机会。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多元治理主体实现“跨界”合作，使得政府听取民众的声音更加便捷，使得人民群众拥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更为多元的参与治理途径，使得社会、企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积极性得以空前提高，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一切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有助于推动教育治理民主化切实落地。

（四）教育治理法治化

教育法治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并维护一个好的教育法规范体系，并确保该体系得到良好的实施。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具有滞后性，现行的法律滞后于技术的迭代，与 ChatGPT 相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形成。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绝不能低估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教育治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良法是善治的基础。在数字化时代，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完备的法律体系的保障。ChatGPT 等数字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给现有的教育法治

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ChatGPT 等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推动科学立法，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第二，技术赋能教育执法。数字技术在教育执法领域的运用，具有全程留痕、可以追溯的特征，对公权力形成了有效制约和监督，增强了教育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第三，以数字技术辅助教育司法。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教育司法转向时间线开放、场景多元、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推动智能审判模式革新，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第四，以数字技术赋能法治教育。ChatGPT 的应用拓展了法治教育的方式，能以人们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更为全面的法治教育，助力全民获得即时的教育服务，从而提高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五）教育治理智能化

如果说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治理理念的应用推动了教育治理从传统经验治理走向数据驱动治理，那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将推动教育治理从数据治理迈向更加智能化的治理之路。Chat - GPT 不仅可以模拟人类对话，还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互联网上获取最新数据进行学习和改进。虽然目前 GPT - 4 还没有联网功能，但通过相关插件，让 ChatGPT 连接进入互联网世界已具备可能。

数据、算力、算法是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核心要素，ChatGPT 在数据深度挖掘、算法不断优化、算力充分支持等方面显示出绝对优势，可以极大地推动教育治理智能化。第一，数据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基石。训练 ChatGPT 使用了 45TB 数据、近 1 万亿个单词。虽然目前 OpenAI 尚未公布 GPT - 4 模型参数数量及机理等，外界也无从得知更多技术细节。但可以肯定，GPT - 4 的参数数量与 ChatGPT 相比有过之无不及。ChatGPT 拥有海量数据，为教育治理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第二，算法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动力。政府的教育决策不仅涉及海量数据汇集，而且对算法的优化日益提出更高要求。ChatGPT 的算法集成了深度神经网络、自监督学习、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和提示学习等多种算法。ChatGPT 算法的不断迭代，将使治理结果更加精准。第三，算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支撑。在算力方面，ChatGPT 的总算力消耗约为 3640PF - days（即假如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需要计算 3640 天）。虽然没有数据披露 GPT - 4 的算力消耗，但从输入支持图像处理、文字输入限制提升至 2.5 万个单词，以及结合未

来多模态下的内容需求来看，算力提升是 ChatGPT 发展的必然结果。强大的算力使得挖掘与整理海量教育数据成为可能，也使得教育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当然，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技术治理”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事实上，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充分运用人类独有的智慧。知名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Russell L. Ackoff）曾提出由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及智慧（Wisdom）组成的知识金字塔，即 DIKW 模型。原始观察及度量获得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间的关系获得了信息；在实际行动中应用信息产生了知识；智慧则是人类对信息知识的理解与作出决策判断的能力，也是利用信息知识采取正确行动的体现。显然，ChatGPT 可以帮助人类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实现数据收集、信息整理与知识处理，而最后一层的智慧，就目前来看，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可以在数据、信息、知识的基础上，预测事物的发展规律及未来走向。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的路径选择

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场域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ChatGPT 可以赋能教育治理；另一方面，ChatGPT 本身具备的不确定性又带来了新的治理风险。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曾在《科技的社会控制》（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书中指出，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在技术生命的早期很难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及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且昂贵。要想突破“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还须结合上文提及的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基本内涵，坚持“两条腿走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要求我们充分利用 ChatGPT 的治理动能；“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则要求我们积极治理数字化教育问题，其重要方面是对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新问题进行防范与治理。要而言之，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的核心原则是规范与发展并举、防范风险与利用效能并重。

（一）完善“一核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

ChatGPT 的一大魅力在于为教育治理提供了积极的弹性空间，可以在优化原

有教育治理结构的同时不打破原有结构的稳定性。不妨借助 ChatGPT，形成更加完善的“一核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进而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我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结构化显现，无论何种数字技术嵌入治理，都不会改变这一本质。各级党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比任何组织、任何机构的作用都要大。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多元共治”是破解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共治”强调调动各教育要素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整个教育系统的活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强化党的领导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同时让学校、社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教育治理中来。多元主体是前提，共治则是贯穿于教育治理的主线。

首先，政府保驾护航。政府作为守门人，需要更加积极有为。针对 ChatGPT 嵌入教育治理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应加强统筹安排，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符合规范且能带来正面效应。中央层面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标准制定，帮助教育参与者进一步明确 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的可为、难为与不可为。省级政府要加大省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力度，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区域、城乡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同时要提高监管能力，积极推动最新教育政策落地，有效防御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

其次，学校自主治理。学校借助 ChatGPT 等数字技术，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人事管理。一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利用 ChatGPT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二是借助 ChatGPT 推动治理理念更新，引导学生、教师、家长等利益主体参与到学校治理中来；三是借助 ChatGPT 进一步完善学校章程及规章制度，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四是利用 ChatGPT 辅助管理决策，比如在对应聘教师进行评价时，ChatGPT 能对应聘者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辅助管理者决策。

最后，社会积极参与。借助 ChatGPT 等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其一，完善第三方专业评价。教育评价的科学与否与评价指标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要积极发挥 ChatGPT 的优势，完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其二，畅通社会广泛参与监督渠道。当前网络监督渠道日益完善，ChatGPT 应用能力的接入，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扩大教育知情权、监督权。其三，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借助 ChatGPT 进一步规范家庭教育行为、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丰富社会教育资源，密切三者联系，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在社会主体中，绝不能忽视市场这一重要主体。ChatGPT 本就是市场的产物，将 ChatGPT 引入教育治理领域时，要认真听取市场的意见，使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与此同时，鉴于市场主体具有逐利性的特征，还要警惕资本对教育公益性的侵蚀。

（二）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体两翼，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之时，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不少学者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应该有所区分，否则也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列开来。从改革实践看，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治理能力并非同频同步，治理体系建设总体上先于治理能力建设。因此，ChatGPT 等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时，不能单纯注重技术之于教育治理体系的作用，还须更加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学者指出，教育治理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第一，提升理解能力重在更新教育治理理念。治理理念变革是教育发展的先导，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数字化思维是数字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应与时俱进地树立数字化治理新理念。在数字化时代，过分夸大数字技术的作用和全面抵制数字技术的做法均不可取。应辩证地看待 ChatGPT 等数字技术给教育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拥抱其技术红利，努力规避其负面效应。

第二，提升执行能力重在完善教育制度。人类的生存方式、教育活动方式、教育生活方式的转换与变迁，必然引发并伴随着教育制度的转换与变革。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 ChatGPT 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不仅推动着教育生态体系重塑，还推

动着教育制度变革。应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相衔接的现代教育制度体系，并增强现代化教育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冲击。

第三，提升创新能力重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ChatGPT 等数字技术可以赋能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安排。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和活动的统筹协调、协同创新和持续改进，以实现共同行动、耦合结构和资源共享。应充分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健全立德树人机制，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推动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三）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

主动式治理框架要求在系统内部嵌入监管机制，强制系统服从国家法令，检验系统输入的数据，避免使用错误的信息导致错误的结论，输出时也检验结果是不是可信和可靠，并且全程留痕，记录在案。主动式治理框架的优势在于危害发生前就可以启动防止措施。应积极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规避 ChatGPT 发展的潜在风险。

首先，构建数字监管机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教育领域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2021 年美国 EDUCAUSE 首次发布了以信息安全为主题的《地平线报告（信息安全版）》，旨在督促相关行业人士能够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信息安全与伦理问题（EDUCAUSE Publications, 2021）。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一是要将数据监管与算法监管结合起来。ChatGPT 的运行依托海量数据，其中大量数据是互联网用户个人上传的信息，这就需要加强对数据的产生、收集、存储和分析每一环节的监管。于算法而言，需要警惕 ChatGPT 生成的虚假信息，应坚持人工验证。二是要形成动态监管机制。Chat - GPT 会不断迭代更新，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问题，监管机制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革新。

其次，健全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一个国家的教育越发达，需要统一的教育标准就越多，随之教育治理的精准化水平也会越高。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

化标准研制工作，《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2023 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围绕平台、数据、资源及素养，我国发布了包括《教育基础数据》《教师数字素养》等在内的 7 项教育行业标准。ChatGPT 作为一项新技术，还须加快研制相关标准规范，以标准化保障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此外，各国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关于 ChatGPT 应用于教育治理的标准研制，共建开放包容有韧性的教育治理体系，共同打造 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的新图景。

再次，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一方面，针对人工智能在开发应用中暴露的大量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应尽快组织起草《人工智能基本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正向发展；另一方面，亟须全面加强教育立法与规划。就目前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仍停留在传统的教育规范层面，尚未将数字技术重点纳入考量视野。而且教育领域并未出台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也未在现有法律条款中补充与数字时代教育相关的法律条款，这就为 ChatGPT 应用于教育领域留下法律漏洞。应尽快完善教育立法，对 ChatGPT 可能带来的教育问题予以法律规制，确保 ChatGPT 促进教育革新而非阻碍教育发展。

最后，实施 ChatGPT 全生命周期治理。“生命周期”最先是生物领域中的概念，用来指代生物在形态或功能上所经历的一连串阶段或改变。与之类似，ChatGPT 亦有生命周期，对其治理应结合其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治理。ChatGPT 的生命周期包括预训练、数据收集、架构设计、模型训练、进入市场、技术更新直到 ChatGPT 退出市场。未来应制定一套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机制，在明确 ChatGPT 研发者的责任归属及承担方式的基础上，对 ChatGPT 的每一生命环节进行监管，以确保 Chat - GPT 是安全的、值得信赖的，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四）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ChatGPT 引发的风险会波及世界各国，解决其带来的问题日益依赖跨国、跨地区的资源整合与组织协作。全球教育治理是指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

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国际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达到全球范围内的好的治理效果。针对 ChatGPT 可能带来的风险，共建协同、畅通、高效、多边、民主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各行为体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教育治理观，构建惠及全人类的全球教育命运共同体。“共商”是指全球各国、国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对关于 ChatGPT 的治理事宜进行平等商议、对话交流，共同拟定解决方案；“共建”是指在确定思路与解决方案后，根据本国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分担全球教育治理的权责，共同参与涉及 ChatGPT 治理事项的建设；“共享”是指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共同分享、共同应用可靠的数字技术，最终让安全的 ChatGPT 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

第二，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肯定教育的多元化。应尊重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需求，联通并努力兼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普适性与特色性要求。针对 ChatGPT 带来的教育治理问题，需要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世界各国应共同致力于寻找规范 ChatGPT 应用的一般性准则；另一方面，应在结合各自国家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寻求 ChatGPT 应用与治理的本国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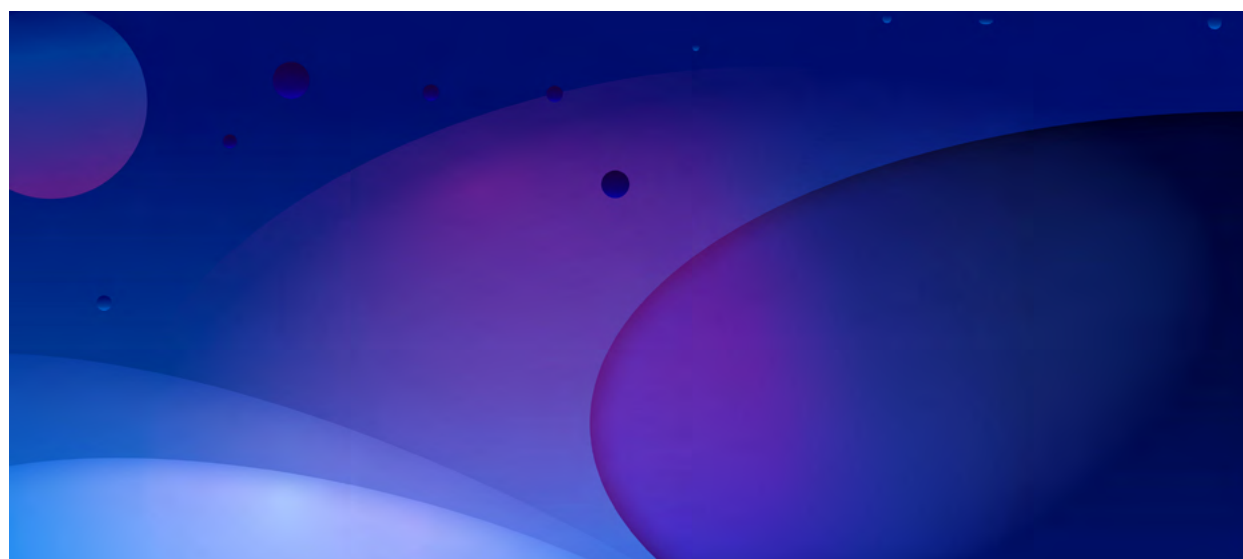
第三，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发挥应有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与时俱进地反思与改进工作，推动 ChatGPT 在全球教育中的应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将自身视为一个合作伙伴，其任务是推进国家间的交流；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成为一个证据中间人、知识生产者，以及加强教育体系数据和公民问责制的倡导者；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当以促进国家和地区教育治理能力提升为己任，帮助世界各国有效应对 ChatGPT 带来的教育治理风险。

第四，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当前，人与人、人与地球、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仅仅关注个体自身发展已经无法应对未来世界的诸多挑战。教育作为一项集体事业和一种共同利益，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应用得当，ChatGPT 将助力每个人实现梦想；应用不当，其负面影响将如洪水猛兽危及每一位使用者。每个个体无论影响力有多大，都应当积极参与到 ChatGPT 的治理中来。

五、结语

看待教育问题时，我们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同样地，我们看待 ChatGPT 之于教育治理这一问题，也需要“跳出教育看 ChatGPT、立足全局看 ChatGPT、放眼长远看 ChatGPT”。“跳出教育看 ChatGPT”启发我们不能将 ChatGPT 的影响局限于教育，ChatGPT 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我们要用系统的观念，在更高的站位上思考 ChatGPT 给教育治理带来的系列变革。“立足全局看 ChatGPT”启发我们要用战略思维看待 ChatGPT，要把全局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ChatGPT 赋能教育治理就是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放眼长远看 ChatGPT”启发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ChatGPT，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其风险的有效规制，未来定能释放 ChatGPT 的治理潜力，开创教育治理新局面。ChatGPT 给教育治理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学习不能讲竞争

来源 | 第三届青少年心理成长与心理健康教育论坛现场演讲内容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明远

当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令人担忧。据有关机构调研,小学生里就有抑郁症存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太重,学生被动地学习,学习竞争给学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学习缺乏兴趣,被动学习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形成了扭曲的心理,把学习作为竞争的手段,把同学作为竞争的对手,缺乏抗挫折的能力。有的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有的学生因为学习受到某些挫折,如考试成绩欠佳或者不如同学而郁闷,有的甚至跳楼自杀。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了该救救孩子的时候了。

出现这个问题,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一是学校发展还不均衡,学校的质量有差距。作为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优质的学校,将来考取理想的大学。二是观念问题,一些家长总以为知识学得越多越好,作业越多越好。一种应试的思维定式,不讲学习的规律,不讲学习的效果。

我讲一个故事。《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叫“生金蛋的鹅”。说的是一个老婆婆养了一只鹅，这只鹅每天生一个金蛋。老婆婆很高兴，但想着如果多喂一点饲料，它每天就能生两个金蛋。于是第二天开始增加饲料，增加到两倍的饲料。鹅越长越胖，结果不生蛋了。老婆婆很生气，说“你把蛋藏在肚子里了，我宰了你取蛋”。老婆婆把鹅杀了，但从肚子里取出来的不是金蛋，是一大块肥油。小时候我读过这则寓言，只是把它当笑话，现在我读了，感觉到现在有些家长就像老婆婆，希望自己的孩子多生“金蛋”，结果却害了孩子。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源上解决。就是把学生从学习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让学生自主地学习，有兴趣地学习。“双减”政策出台，本来是想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学生课外上各种培训班的学业负担。两年多来，虽然校外培训机构基本得到整治，但补习班还在暗中涌动，有的家长请培训机构的教师到家里个别辅导。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据说一年要花十几万二十多万元，这都源于家长的焦虑。更深层次的压力来源于社会竞争的压力，这也难怪年轻父母。但要知道，孩子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教育是有规律的。遵循规律，孩子就能顺利发展，违背规律就会适得其反。

学习是不能讲竞争的，学习是要友爱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样，将来到社会上才有竞争的實力。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竞争，因此有人说要从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竞争是到社会上去竞争，不是在学习时竞争。在学习时竞争，互相保密，怎么能进步。例如乒乓球队，训练时讲竞争，每人留一手，怎么能争得世界冠军。另外，竞争时只能我好，不能你好，这就形成扭曲心理，养成不能与人合作的脾气，甚至产生不良的后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 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就说：“学习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努力。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面的现实存在。”又说“学习不应只是个人的事情，作为一种社会经验，需要与他人共同学习，以及通过与同伴和老师进行讨论及辩论的方式来学习。”可见，学习是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

化解家长的焦虑和学生学习的心理压力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转变观念，二是制度设计。

教师也好、家长也好，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党中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教育既要培养高精尖杰出人才，又要培养大国工匠、现代农民。教育要因材施教，顺应孩子的天性，充分发挥他的潜在能力。教育不能讲竞争。其实，负担减轻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心情舒畅了，学习效率会提高，学习成绩会提升，学生会享受到学习的愉快和童年的幸福。所以我经常说“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同时，学生负担减轻了，就有时间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去了解世界、了解社会，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有利于他们将来的学习和发展。

第二是要加强科学的制度设计。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加强公共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首先要大力推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当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之间还存在矛盾，每位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子女进入优质学校，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教育均衡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学生负担过重的难题。但均衡发展不可能没有差异，家长要转变观念，支持和帮助学校改革，支持和帮助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而不是把选择学校作为竞争的目标。

我提倡实行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把小学和初中连贯起来。小学生的潜能是很大的，五年完全可以完成六年的学业，这已经被实践证明：北师大实验小学从1958年开始进行了三十年的五年制实验，培养的毕业生都能顺利地到初中学习。九年一贯要对课程进行整合调整，高年级设一些选修课，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做到因材施教。九年一贯还可缓解家长小升初的焦虑。

其次，要办好每一所学校，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是有差异的，应该因材施教，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要深化教育改革，要把课堂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主渠道，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上好每一节课，

教好每一个学生。一堂好课的标准是能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能不能关照到每一个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听懂学会了，就可以减少家庭作业负担。现在人工智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条件。

第三，要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儿童是天生的好奇者，在会说话以后就会问这问那，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我们要呵护儿童这种好奇心。到了小学就要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有了兴趣他们就会自主地刻苦学习。

第四，教书育人在细微处。教师和家长都要细心观察学生，重视学生的思想情绪。要经常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需要和困扰，帮助学生化解矛盾。

第五，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社会要积极提供学生活动的场所，使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地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扩大眼界、增长智慧。

最近，课间十分钟怎么安排，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还是让他们走出教室活动活动，成为社会的议论的热点。这里体现了两种教育观念。当然由于学校管理制度的缺乏，教师校长都怕担任责任。但这关系到孩子的成长。把孩子关在教室里，不仅有碍于孩子的身体发育，也使孩子缺乏活力，使孩子对事物缺乏激情，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

家长对孩子在活动中的磕磕碰碰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记得当年我在美国参观幼儿园时，发现他们的设备很简陋，活动园里堆着许多汽车轮胎、钢铁架子。孩子在那里爬上爬下，看了很危险。我问教师，孩子会不会摔坏，家长会不会告你们？老师回答说：“家长送孩子来幼儿园，就是来锻炼的。”可见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总之，学校、家庭、社会都要对学生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使我们的孩子能够生动、活泼、健康地发展。

申国昌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来源 | 《现代教育管理》2024年05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秘书长 申国昌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速度与成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更要与时代发展同向而行，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作为与经济社会有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发展态势与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转型息息相关。为充分释放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效能，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应适应形势，主动作为。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逻辑就是从根本上回答如何适应“数字革命”的发展需求，响应“数字土著”的成长需求以及回应“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换言之，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关键纽带，对提高技能型人才素质，适应数字化时代就业市场需求，促进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进而稳定就业，保障民生，

提高人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内在价值的全景式探析，在充分挖掘其本体内涵的基础上，提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是助力职业教育应对当前以数字化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必然选择。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仿真等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从原有追求规模化的粗放型发展转向创新生产要素的精细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科技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势必对人才素养、产业结构、教育体系、个人成长等提出新的要求。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教育类别，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行业变革和产业升级保持敏锐性，因势利导地对职业教育进行立体式变革，这对凸显职业教育办学优势，顺应科技赋能教育趋势，创新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终身化职业教育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契合职业技术人才素养新需求

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技术革命是引起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要素，在技术革命驱动下，工作类别、数量、方式、过程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之又对劳动力素养模型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作为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主力军，职业教育应把握时代发展走向，对标企业基于技术变革而对技能型人才提出的现代化素养模型，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职业教育，使其成为我国高水平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培养基地。因此，在新的产业变革中，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方面被寄予厚望，这正是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性，职业教育作为行业与教育的“中转车间”，使职业教育在理论与技能、教育与就业的结合与过渡之间有了契合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新增修订的150多个职业类别中，有97个职业类别是数字技能职业，数字技能职业占新增职业的61%。由此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职业类别结构性调整已充分显现。

为回应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职业教育应以数字化技术为技术驱动，以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为需求导向，从而使人才培养与用人市场达到供需平衡。具体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人才培养理念上，受人工智能底层逻辑的影响，职业教育的人才观也将呈现更加多元、开放、个性化的特点，从而有利于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深入联动；其二，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职业教育通过主动引入数字化技术，创新教学场景，加强实践环节的沉浸式教学，丰富学生的具身体验，使学生在数字化教学的过程中提高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化思维，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其三，在专业设置上，随着经济模式升级和科学技术创新，一大批新兴产业也应运而生。职业教育基于服务基础制造业的办学定位，其专业设置与行业变革需始终保持动态平衡，以确保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与行业用人需求遥相呼应，从而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

（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激活职业领域科技创新新动能

技术革命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从蒸汽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社会生产方式也从最初的机械化生产进阶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模式。职业教育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技能培养为主要特点的教育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任何一次技术变革中都不能置身事外。换言之，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变革之间存在强关联。但有学者指出两者在逻辑上并非相互独立，并认为技术性是职业教育的本体属性，而职业性是技术性的派生属性。从这一层面上来看，社会生产力水平为职业教育发展构建起外在技术场域，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现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与方式培养技能型人才，从而更好地释放职业教育拉动就业的重要潜能，以彰显其职业性。与此同时，各种数字化技术不断颠覆传统教育模式，并创新教育数字化新样态。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涌现不仅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也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

职业教育想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有所突破，必须在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中求得生存。目前，数字化技术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对职业院校进行赋能：其一，

在技术层面，职业院校通过搭建数字化教学平台，构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并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进行“人机互动”，为实践教学创造真实化场景，为学生掌握技术技能创设沉浸式教学环境。其二，在理念层面，数字化技术通过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走向，扩展专业视野，激发学生自学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对数字化信息的筛选判别能力，使学生在掌握前沿科技知识的基础上会思考，善创造，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提供了沃土。其三，在多主体参与层面，数字化时代的职业教育为应对产业升级，通过技术赋能，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助力形成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价值链一体化发展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应对技术变革具有独特的敏锐性，主动求变，下好数字化转型的先手棋，通过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耦合，实现对教学效率与社会适配性的兼顾。

（三）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构建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新样态

在新兴技术与教育数字化变革两者逻辑关系中，新兴技术于教育数字化变革而言并非始终处于自变量地位，相反，教育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了新兴技术的形成与创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因此，作为我国技能型人力资源培养的主力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优化人才结构，创设就业岗位，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巨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带给就业市场格局性的改变，未来将有更多职业面临被取代的风险。但是，技术革命取代了部分职业必将创造出新兴的职业，职业教育如何把握技术革命带给人才就业市场的趋势走向事关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优劣的关键所在。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更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助力职业教育以更宏观的视野对人才培养走向进行谋篇布局。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运用数字思维，通过对相关数据收集、记录、分析，科学评估开设专业与市场的适配性，从而调整其专业设置。同时，基于数据预测，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对职业教育招生人数进行动态分配，确保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匹配度与精确性，从而避免出现人才同质化和供需失衡现象。除此之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数字化对职业教育的赋能，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在教学资源共建、

教学质量共评、教学成果共享方面联系更为紧密，实现了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适需服务的目标。数字化转型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思维认知层面。在如今的数字化世界中，跨界、融合、创新是新的时代标签。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更加开放、多元、互通的理念深入推进与学历教育、科学研究、产业趋势互联互通。在技术创新发展中，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转型，以人才培养为中介变量，发挥其加速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的间接作用。

（四）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催生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新体系

构建职业教育终身化学习社会有助于劳动力群体实现技能的持续提升，是规避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结构性失业和降低收入差距的有效举措。在数字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择一业而终”的职业观念越来越体现出时代局限性。受此影响，劳动者必须具备持续学习，使自身所掌握的技能不断更新。只有如此，劳动者才能在新一轮的职业变更中获得更高的工资溢价。因此，构建职业教育终身化学习社会能够为广大劳动者提供相对公平的职业发展机遇，让每位劳动者都能通过持续学习，精进技能，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将职业教育作为构建终身化学习社会的切入点，是基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打造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学习平台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于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

首先，在多主体参与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将以更加开放多元的姿态满足不同学习者的职业发展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在线教育市场迎来井喷式发展，在在线学习的注册用户中，职业教育板块在线学习人数占四分之一，此数据仍呈逐年递增趋势。由此可知，学习者对职业技能的在线学习需求量巨大。对于企业而言，相比企业内部培训流程，通过职业教育学习平台，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通过个体自学的形式获得系统的职前、职中培训成为更省时高效的途径。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同时为求职者提供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提高求职者与岗位的匹配度。其次，在构建智能化学习平台方面，职业教育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云、网、端”三位一体的学习平台，为学习者创设灵活自由的学习场景。除此之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致力于打通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立交桥”，借以提高在线学习的认可度，调动

学习者的自学积极性。再次，在丰富在线教育资源方面，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基于产业行业特点，结合岗位需求，开发品类丰富的职业教育在线课堂，为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知识学习资源。据统计，目前已有2万余门课程在国家职业教育智慧平台上线，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每位劳动者持续学习、自我成长的职业规划。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构建学习型社会，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提高劳动者职业胜任力的应然选择。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体内涵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数字化系统、数字化平台、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品等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进而促进教学活动全方位变革的过程。基于这种复杂性，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解读如果仅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那就是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知窄化。事实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丰富且全面，主要体现在教学精准化、学习具身化、管理智能化及评价可视化等方面。

（一）教学过程精准化：实现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学目标应关注人的发展。然而，个人应该发展什么，如何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借助科技赋能，创新教学的各个环节，用智能化的技术重塑教学流程，构建新型数字化课程教学新生态，从而有助于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当前，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职业院校主要通过引入虚拟仿真技术、开展场景式教学等方式，促进人机互动，从而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和精确性。

教学技术是现代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职业教育学科专业与产业类别的密切关联性，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运用数字化技术技能对教学各要素进行创新和改造，使教学过程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从而培养出具有数字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当前，现代技术拓展了职业教育教学所需的物质空间，并构建了以实体环境与虚拟空间交互的综合教学场域。数字化的教育手段在培养应用型、

技能型人才上，最大优势便在于它能够借助数字化手段，如音频、视频等向学生传授职业技能。因此，职业教育所需的数字化教育环境除了在线教育平台、多媒体设备等以互联网技术为特点的物理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以VR、数字孪生、全息影像等智能化技术为依托的实践场域，以实现课堂教学智慧化、虚拟化、智能化的升级。例如，借助VR技术，可以将实体工厂进行虚拟化呈现，从而开展实训教学。VR是指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可以让使用者产生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重感官交互的虚拟仿真技术。基于VR技术的特性，可以将其应用于职业教育中，构建学生实训虚拟工厂。这种数字化实训教学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有助于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技术操作、行业特性、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对于降低学生实训成本，并在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方面成效明显。除此之外，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对理论知识可视化、形象化的呈现可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领悟程度，学生在这种知识与感官多模态交互过程中实现深层次人机互动式的沉浸式学习场域，从而有利于帮助学生获得具身体验。此外，为响应国家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方针政策，智慧课堂在各级各类院校已普遍存在，职业教育也不例外。智慧课堂相比于单一的数字化教学技术应用更侧重于综合性，是整合了互联网平台、教育应用程序和数字化教育资源于一体的综合教学场域，在该场域下，教学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生成性，从而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基于智慧课堂的智能化、数字化、交互化特性，职业教育应充分利用智慧课堂的数字优势，让智慧课堂成为职业教育学生顶岗实习、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的数字桥梁，从而助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发展。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驱动，职业院校要敢于运用数字化教育技术，同时更要善于运用数字化教育技术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时代的适配性，从而释放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

（二）学习体验具身化：创设沉浸交互的学习场景

人机融合可以使教育者与技术以真正融合的姿态实现技术的具身与应用，以人机一体化的方式重构教育者的学习体验，使学习者的身体、感知、认知得到质的增强，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应用智能产品、开展教育教学，实现变革教育的理想。场景时代的共在性和共时性特征使体验比实践更重要，职业教育应从实践核心转向体验核心。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场景教学”革命悄然诞生。

所谓“场景教学”是指教学环境与教学内容具有契合性，教学场景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不断重设、建构，使之可以最大程度地为教学内容提供场景支持。因此，在以项目学习为主的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更需要通过对教学场景的构思、设计和构建，为学生尽可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增强环境代入感，引导学生能够快速进入角色，从而提高学生实践的有效性。场景教学的核心是关注学生的体验感。目前，虚拟仿真、全息影像、VR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具身体验。职业教育虽然是以传授技术技能为主的教育类型，但在技能讲授过程中仍需关注美好真实的场景体验。因为，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论来看，任何形式的教育都离不开复杂的文化场景，包括学生个性、教师能力、同伴交往、师生互动、课堂教学等，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文化情境，而教育将在此情境中发生。所以，对职业教育而言，训练技术技能并非终极目的，而是要基于场景教学，引导学生沉浸其中、代入角色，进而开展技能教学。如在学前教育专业幼儿保育保教知识课程中，通过创设场景化教学，不仅可以将枯燥的知识场景化，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以获得超越技能训练本身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数字化技术让单一的教学空间有了无限变幻的可能，通过数字化技术创设的场景教学空间实际上是以激发学生对生活真实的情感体验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学习知识或技能的内驱力，从而让教育悄然发生。对于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脱离生活，独立的技能培训并不能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认同。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转型，让场景教学成为常态化教学模式，培养出既有职业信念和职业素养，又掌握高超技艺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

（三）管理模式智能化：打造高效互通的管理体系

教育数字化治理事实上是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内嵌与耦合。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体现在学校管理层面上是以整体、系统、联动的方式进行改革升级，而非进行的局部的技术性改造。当前，职业院校以专业特色和技术需求为出发点，积极探寻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力求打造一套整合全要素，覆盖全领域，联通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当前，基于《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监测指标》要求，各大职业院校通过

自主研发或购买服务的形式对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进行全面升级，使之更加人性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在教学管理系统数字化改造过程中，职业院校围绕学生、教师、综合服务、管理评估，顶岗实习进行独立平台搭建，极大地提高学校管理效能。首先，打造学生发展服务平台和教师发展服务平台，在此平台上学生进行账号注册后可以同步记录学生的听课信息、学习成绩、实训评价等所有学习相关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生成学生的“自画像”，有利于教师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并为客观的教学评价提供依据。同时，建立教师发展服务平台，该平台以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体系为依托，将教师教学能力、科研成果、职称评定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过程记录和结果分析，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教师已取得的教学成果和职业发展轨迹。通过对数据的线上管理有利于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助力教师队伍长足发展。其次，组建线上综合服务办事大厅，并配套开放微程序，实现校园生活一站式服务，并简化流程，及时反馈，极大地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再次，构建监测评估管理平台，该平台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监测和分析，便于学校精准了解学校发展现状，从而为学校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发挥学校过程性监管的作用。最后，建立岗位实践管理系统。对职业院校而言，如何对校外实习的学生进行监管是学校管理的难题，也是职业院校在学生管理事务上必须走完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岗位实践管理平台的搭建，学校可以通过签到、到岗率抽查、实习日志、校外指导老师评价、考核评定等维度对学生进行监管，实现了对学生从校内到校外的闭环管理。整体而言，通过技术赋能对职业院校教学管理事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并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构建了以数字信息为依托的数字基座，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之路能够行稳致远。

（四）评价路径可视化：形成以评促建的评价过程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也不断在教学评价中渗透，通过对数据的记录、收集和分析开辟了教学评价新思路，创新了教学评价新路径，重塑了教学评价新理念。总之，教学评价不能忽略所处的社会形态，要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带给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变革，积极探索智能化教育评价体系与路径。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变革的成效，使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提高教学评价质量的关键所在。鉴于职业教育的跨界融

合性，职业教育中通常存在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标准多样化的现象，这种评价方式难以为教师教学和学生提供有效的参考，进而阻碍了教学评价发挥其客观的反馈效力。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技术对教学评价进行全面改革升级，使其实现过程性评价、个性化评价、多元化评价、量化性评价。借助多种评价方式，形成评价合力，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形成自主化学习意识和能力。

首先，关注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是将评价关注点由结果转向过程，换言之，是将评价贯穿教学始终。通过过程性评价便于得到及时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学习方式，保证教学效果。相比传统评价方式，职业院校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全方位地获取教学活动中的各项数据信息，建立多视角分析维度，通过对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形成个性化的学习画像，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次，注重个性化评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数字化平台先通过收集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原始数据采集，基于智能化分析帮助教师初步了解学生的学习偏好，进而便于开展个性化教学。再次，整合多元性评价。在教学过程中，目前部分职业院校所创建的智慧教室中初步引入了课程行为分析系统，利用该系统可以记录师生的课程行为表现，通过捕捉不同行为表现形式，对学生形成多视角，立体化分析，从而打破单一评价标准，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最后，开展量化性评价。通过数字化评价系统对学生个体原始信息的收集和学习过程的记录分析，可以形成直观的数据指标便于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化分析模型，将各类数据以清晰的图谱形式进行展现，为教学评价提供客观参照标准。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提高职业院校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人才供给能力，支撑国家战略布局有重要意义。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效发展，职业院校应从树立教育数字化理念，铸牢教育数字化基座，提高教师数字化素养，推动产教数字化融合等方面着力推进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

（一）理念先行：树立职业教育数字化新理念

通过数字化赋能我国职业教育，开启了我国职业院校提质培优的时代篇章。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要，职业院校应创新治理理念，通过对数字化技术的理性认识来指导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创新发展理念是行动改革的前提，形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的认识体系，有助于打破“新瓶装旧酒”的职业教育改革怪圈，立足国家对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方针，把握数字化内涵本质，聚焦理念创新，构建育人体系，重塑评价标准，以期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明确的价值导向。

其一，塑造数字化思维。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新兴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颠覆传统生产模式的思想理念。当今社会已经迎来以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作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体，职业教育要从思维理念上把握数字化的意义内涵，了解数字化的底层逻辑，进而对职业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使之更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首先，职业院校的决策层要树立数据管理意识，形成数字化思维。目前，职业院校都已搭建数字化教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平台的数据痕迹可以清晰再现教学管理流程，并借助数据统计技术对相关事项进行多维度分析比较，便于形成清晰的教学管理量化图。因此，职业院校的决策者应形成对数据的敏感性，善于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为决策提供客观量化指标，提高教学管理的科学性。同时，职业院校应积极应对数字化技术的更新迭代，积极拥抱技术变化，关注新兴技术前沿动态，适时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平台，为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物质支持。

其二，树立正确的学生数字化素养观。培养学生数字化素养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联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在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也要养成学生的数字化素养，以便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市场需求。何为数字化素养，如何培养学生数字化素养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职业院校首先应树立正确的数字化素养观，以避免在后期培养过程中出现路径偏差。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特征以及数字化思维的底层逻辑，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数字化素养过程中应秉承内隐性观念意识培养重于外显性能力技术运用的原则。数字化

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产业升级，重塑了职业分工，未来部分行业出现“机器换人”的局面已成大势所趋，相比训练学生掌握不同数字化工具的操作技能而言，思考如何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综合素养，增强自身的职业竞争力才是职业教育应该关注的要点所在。因此，职业教育应立足未来，关注本质，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筛选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自控能力、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及信息安全意识等，通过这些能力的养成，使学生真正适应数字化时代对人才的切实需求，并提高自身的职业胜任力。

其三，树立正确的数字化技术观。数字化时代技术变革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助力，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中也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实现教育流程再造。然而，过分推崇技术，难免会陷入唯“技术论”的窠臼当中而阻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事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职业院校应保持技术理性，科学评估数字化技术引入教育场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避免数字化技术在教学场景中的生搬硬套。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字韧性，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搭建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便捷性，但也增加了学生被网络信息裹挟的风险性。职业院校应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优化学生的学习路径，并通过教师引导培养学生对数字化技术的驾驭能力，从而规避数字化教学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除此之外，职业院校还应树立数据安全意识，积极尝试数字化技术带给教学的创新和改变，但同时也要时刻秉承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使数字化转型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二）强基固本：铸牢职业教育数字化新根基

数字基座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基。完备且部署科学的数字基座可以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持久的发展助力，如果失去数字基座的支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无从谈起。通常，职业院校中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资源以及智慧教室等要素共同构成数字基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基础设施为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是其先决条件。因此，职业院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筑牢数字基座。

其一，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技术支撑。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数字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为职业院校实现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保障。

因此，职业院校应着力完善数字化网络体系。首先，职业院校应进一步提高校园网络覆盖率和网络出口带宽，为师生打造流畅的数字化校园网络环境；其次，创新数字化应用场景，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与日常校园活动场景的融合路径，构建便捷智能的校园网络平台，助力校园数字化建设；再次，依托校园网络设施及数字化技术，打造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的智能教学空间。

其二，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效能。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健全组织机构，优化服务流程，提高组织管理效率，通过技术赋能为职业院校构建组织有序、运行规范的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因此，职业院校数字化体系建设应依托我国所提出的“1+5”体系，即职业教育决策大脑系统和决策支持中心、精品在线开放课堂中心、虚拟仿真实习实训中心、职业学校治理能力提升中心。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字化思维改造升级业务布局，创新管理模式，有效促进职业学校中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制定数字化工作流程，优化相关部门间的业务对接，切实提高职业院校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

其三，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优化资源质量。数字化教育资源是培养掌握数字化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载体。当前，在线教育平台已成为学校之外另一个获取知识的主阵地。职业院校应适应当下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趋势，以教学需求为驱动，以专业特点为基础，以数字化技术为抓手，以学习心理需求为切入点，积极研发适应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数字化教育资源，着力打造信息承载量低，讲解生动有趣，参与感强，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成就感的细颗粒度学习资源。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建，拓展教育资源边界，创新教育资源形式，整合各类优质教育资源。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创建品类丰富、内容齐全、获取便捷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三）与时俱进：提升教师队伍数字化新素养

专业化的数字技能师资队伍是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也是我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直接决定数字化教学技能与课堂的融入程度。因此，着力提高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运用能力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由于对数字化教学技能的掌握不仅停留在实际操作

层面，更重要的是要从观念意识层面上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带给教育的变革。因此，对教师数字化素养的培养应涵盖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图景。

首先，在思想意识层面，引导教师对数字化技术的理性认知，鼓励教师创新数字化使用场景，同时还要提高自身对数字化教学工具的筛选能力，从而使教师能够基于学科特性，自主选择适用于教学的数字化工具，实现数字化与教学的深度耦合。

其次，在技术运用层面，职业院校应积极引入新型数字化教学工具，尤其保持对数字化技术迭代的敏锐度，为教师搭建数字化教学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要加强教师培养，确保教师对新型数字化教学工具能够熟练操作，避免在数字化课堂中出现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表演式教学。

再次，在教学管理层面，鼓励教师运用数字化平台与系统对教学、课后辅导、实习记录等教学环节进行数字集成管理。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偏好、学习路径、学习反馈等，以便开展个性化教学。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具备数字化教学创新意识，基于职业教育贯通理论与实践的特殊教育属性，针对实践要求较高的专业教师要以教学效果为导向，充分发挥教学反思智慧，教师身处一线教学场景中，既是数字化技术的使用者，又是数字化技术的设计者。总之，教师要善于总结教学经验，并将经验转化为数字化平台或系统的强大功能，从而使数字化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四）互联互通：推动产教协同数字化新融合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得以嵌入市场，并与行业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显著特征。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具有数字思维并掌握创新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创新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中通过技术赋能，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科教融汇，促进理论创新、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之间的有机贯通，实现技术应用与科学研究间的双向赋能。

其一，发挥政策引领作用。职业院校通过探索现代管理机制，制定科学政策方案，形成以政府、企业、院校、科研机构等为主体的多元参与、协同共建的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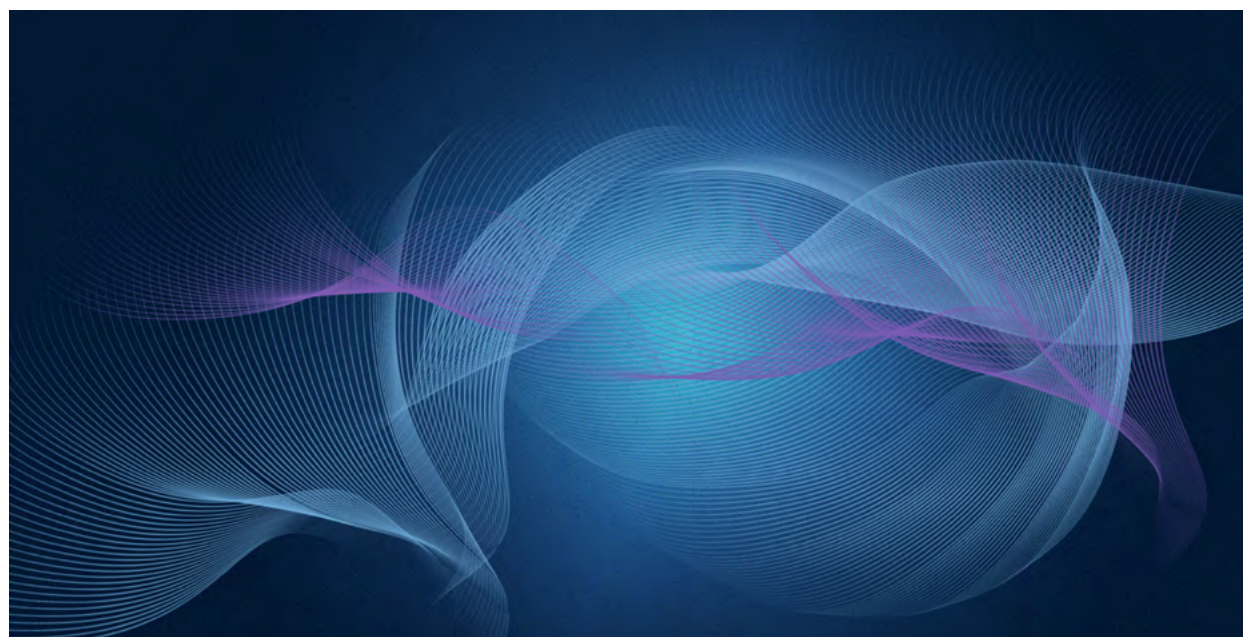
代化职业教育共同体。首先，政府应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特点，通过政策调控重点扶持相关企业，使企业主动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发挥其人才培养主体地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或减免税金等方式鼓励企业积极与职业院校进行对接，主动将培养技能型人才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并为职业院校提供人才实训基地，为职业院校落实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合作平台。职业院校也应创新与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通过开展项目式教学、课程共建、教材共编、校内外“双导师”制等形式形成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新格局，从而在培养复合型人才过程中实现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互通联动，释放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引领作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衔接。

其二，构建合作共同体。职业院校应与政府、行业企业等组织部门共商共建、联动发展，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多部门协同机制。职业教育应立足行业变革需求，积极构建校企合作共同体，并鼓励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等多主体参与，充分整合政策、资金、科研等各项资源，提高职业教育技术创新能力，探索“科、教、产”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新模式。同时，职业院校应创新发展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优势，通过政策引导，体系共建，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将企业纳入教学主体当中，以解决企业技能难题为切入点，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其三，科研与技术转化并重。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肩负为国家新一轮经济变革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历史使命。因此，职业教育应扭转过往侧重于技术技能培养的单一育人模式，而应该将科研思维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培养出一大批懂技术、能科研、善创新的高水平技能型人才队伍。职业教育应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积极探索与企业、行业、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合作路径与机制，建立起以攻克企业技术难题为切入点，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的长效贯通机制，从而全面整合教育资源、科研资源与企业资源，发挥人才培养、科研转化和技术创新的聚合效应，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此，职业院校应通过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畅通与企业 and 科研机构的资源互动渠道，帮助职业院校时刻掌握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和科学技术前沿成果，进而调整专业设置与相关教学实践

活动。除此之外，职业院校通过与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分别从人才交流、项目合作、成果共享等方面探索科研团队、实验室等资源共建机制，突破科研与职业院校各自为营或点状链接的传统合作模式。

综上所述，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人才链、产业链和科技链，全方位构建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沉浸交互的学习场景、高效互通的管理体系和以评促建的评价机制，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其特有价值，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兴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助力，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陈 丽

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变革，在“术”更在于“道”

来源 | 数字教育内容生态共建合作大会演讲内容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丽

很高兴能够与各位同仁一起探讨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和创新方法，在新发展阶段中提供更优质的数字教育内容。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数字教育的内涵与形式正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而发生根本性变革。

我们要对高质量数字教育产生明确的共识。我认为，高质量的数字教育是与数字文明相适应的教育，其并非只是技术的叠加，更是一种教育的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教育，是能够培养数字文明时代合格的接班人、有竞争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从工业时代标准化的学校教育，向数字时代更加包容灵活、更满足个性化发展和终身学习的新教育体系的转型。这不仅是教育手段的转型，更是一场涵盖教育理念、组织形式、治理体系乃至整个教育生态的深刻变革。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绝不仅仅是依靠技术进步所能达成的，它挑战着我们对教育原则的根本认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道”。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技术如何改变教育的“术”，如何赋能教育的手段与实施路径，更要深入思考教育基本规律的变化与革新。研究者、教师、出版社、企业都应以新的教育规律指导数字教育内容的生成以及对应工具的研发。

知识属性的变化

知识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智慧，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划分出了物理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知识世界是人类用符号和载体表征出来的、有限的客观世界的内容，知识的传播受表征符号和载体的形式而演变，也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知识的表现形式、传播途径以及教育模式都经历着显著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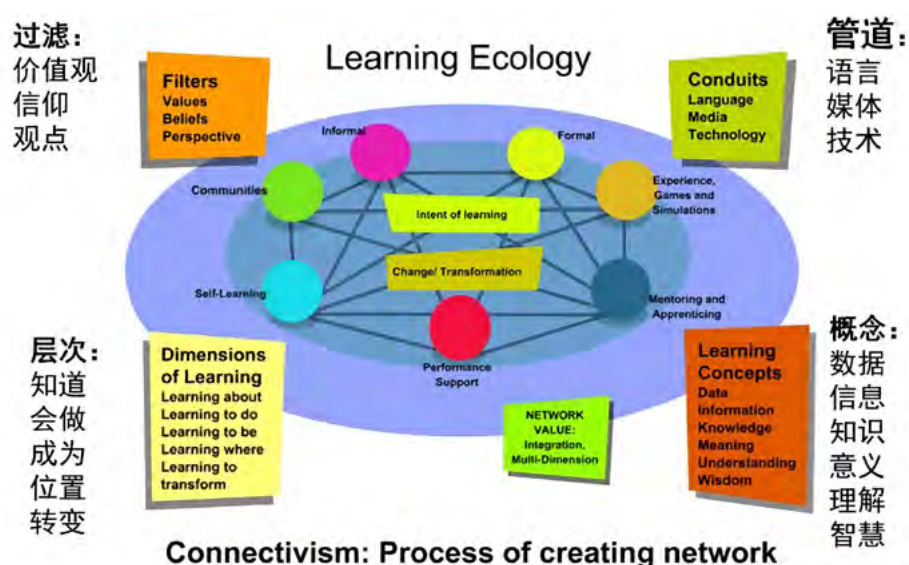
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校教育体系，也并非自古就有，而是伴随印刷媒介的问世而逐步形成。得注意的是，进入数字时代尤其是互联网 2.0 时代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和多模态音视频符号的应用重塑了知识的内涵、形式、生产与传播机制，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探索新时代的教学模式和数字内容形态至关重要。



2019年，我提出了回归论知识观的理论，从中能够看出农耕时代、学校教育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人类知识属性的不同。以往的知识是被过滤的有限内容，而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回归到全谱系的、各种形态的人类智慧。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音视频信号的使用，人类全部生产生活的智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并且快速更新，这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出版行业的巨大压力。

互联网催生了一类新的知识形态——网络化知识，它超越了单一节点，强调节点间的关系和结构，这与人脑中神经元及其连接模式相似。同时，互联网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群智涌现，以GPT为例，尽管其本身不具备智慧，却能够通过算法整合群体智慧并生成全新内容。这一群智汇聚涌现的知识生产方式意味着机器已经在记忆和汇总能力方面超越人类，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如今，互联网环境下的群体智慧快速涌现，每个人既是知识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知识迭代加速，也催生出了新的学习方式——个体携带低价值经验加入专业知识社区，获得更新速度更快、专业性更强的知识。尤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正在兴起——知识变得更加碎片化和问题导向，打破了过去以学科划分边界的系统化组织方式，更倾向于问题解决的实际需求。



■ 学习本质的发展

面对更具完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应该如何学，学校应该怎么教，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教育从业者。在互联网环境中，一种名为联通主义的学习现象正在发生。联通主义强调人的发展与神经网络、概念网络、信息网络有关，学习是大脑与有价值的信息源建立联系，逐渐构建个体信息网络的过程。在互联网环境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丰富，信息网络的差异成为决定学生个体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帮助学生筛选有益信息源并建立有效联系，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策略。

实证分析显示，在互联网环境背景下，学生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跟其概念网络呈正相关。换言之，学生在社群中的地位提升，直接促进了其概念网络的拓展，构建个人信息网络对于增强学生知识结构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教育的新使命在于营造一个能够促进和支持学生信息网络构建的生态系统，培养构建信息网络的能力，已成为当下的学习本质和个体发展的新途径。

■ 课程形态的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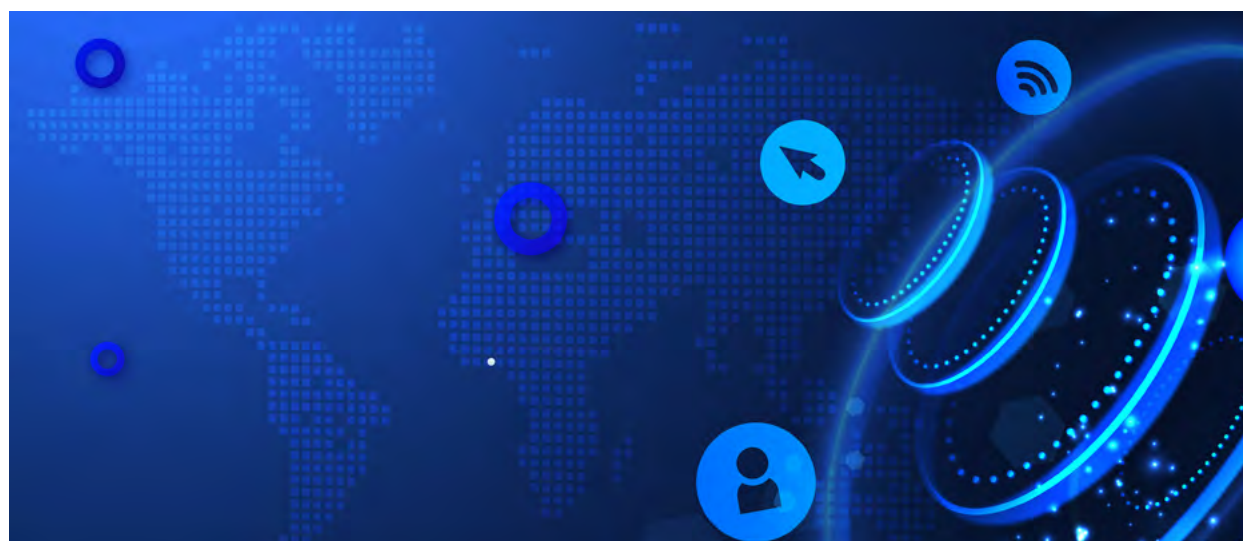
自 2018 年起，我和团队着手探索基于联通主义思想的新型慕课形态，课程不是由教师单向讲授，而是为学生选择信息来源，帮助学生搭建个人的信息网络支架，为学生营造出一个鼓励探索、分享、评论、提问、社交的学习生态。

该课程的核心学习路径不是系统化的知识概念体系，而是以主题为线索的群智汇聚。学生们带着问题进入课程，通过汇聚其他学生的经验解决问题，在实现群智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促进学习者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联通主义学习平台具有分布式、生成内容汇聚、个性化推荐的特点，课程学习内容具有综合性和生成性，设置开放复杂、综合交叉的学习主题并提供支架引导，促进社群发展、深度联通、知识创新，形成了以多个学习者为中心的自组织网络。在学习评价方面，课程基于参与活跃度、个人影响力、知识贡献度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系统通过交互过程的数据，对学生自动评价。

经过九轮的课程迭代优化,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智能时代的背景下,课程的意义已远超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进化为一个促进联通的知识进化社区。个体与社区在学习过程中互惠发展,网络发展与知识创生相互促进,个体在知识进化社区中构建信息网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网络化知识以实践为导向,是多视角、动态变化的,而出版类知识以理论为导向,是学术视角、系统思辨的,二者之间能够形成极佳的互补关系。此外,网络化知识中的联通主义学习者能够展现出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决策能力等能力特征,同时具备出色的数字化素养。

总之,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转型的关键节点,以互联网 2.0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不仅为教育的手段赋能,更推动着教育供给机制、组织体系、教与学的模式方法、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甚至触及到教育的核心哲学问题,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本质,影响教育的“道”。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发展必须深刻理解并顺应这些根本性变化。我们开发的教育资源必须与新时代的“教育之道”同向而行,进而有效促进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跨学科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并在高等教育阶段精准地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希望从事数字教育内容开发的同仁们关注“教育之道”的变化,不仅要优化现有做法,更要勇于创新,以此积极支持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共同为教育的未来贡献力量。



杨宗凯

从“3C”走向“3I”：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纵深发展

来源 | 《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04期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教授 杨宗凯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数字化既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之举，更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先手棋。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正值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第3年开启之际，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强调，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为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明方向。高等教育是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点，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站在新的起点，深刻总结高等教育数字化在“3C”建设中的成就经验，深入探究高等教育数字化在“3I”

道路的先导实践，系统研判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前景，是加速高等教育数字化全局性变革、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应答。

一、“3C”奠基：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成就经验

自2022年全面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我国秉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核心理念，贯彻“应用为王、服务至上、安全运行、简洁高效”的基本原则，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联结为先：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关键支撑。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完成5次迭代升级，通过整合各级各类教育平台，汇聚各类优质资源，开展示范应用，为师生、家长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18个省（直辖市）已开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试点。截至2023年底，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1亿，浏览量超过367亿次、访客量达25亿人次。作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三大平台之一，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联通爱课堂、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智慧树等课程平台，分类呈现热门课程、一流课程、新开课程等资源；所有在线课程平台的学分课均纳入管理范围，并具备门户聚集和开关控制能力，实现“平台评平台”“平台管平台”。同时，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已初步建成，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延展运行监测范围，拓展监测深度，采集数据500余亿条。平台提供招生考试、学历学位、出国留学等30余项服务，累计办理量超过8000万；一年来发布各类岗位1755万个，近1/3高校毕业生通过平台就业。

智慧教学环境是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基座。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高校打造终端交互、智能感知、智能分析的智慧教室、智慧实验室和智慧校园。截至目前，已实现全国高校无线网络全覆盖，并持续建设教育专网、升级校园网络，提供高速、绿色、便捷、安全的网络服务；推动在线教学平台开放协同，不断完善平台服务功能，有力支撑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充分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成为“新常态”；建设数据治理

平台，开展两批共 61 所高校试点工作，通过各类政务数据共享，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数据流通，创新新生注册、精准资助、智慧思政、校园安全等应用场景，赋能各类管理服务；健全网络安全防护机制，加强云、网、端等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通过数据存储加密、统一身份认证、推进国产正版软件使用等方式打造可信技术体系。

我国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创新。自 2021 年以来，教育部连续实施三批虚拟教研室试点，汇聚同一专业、同一课程（群）、同一研究领域志同道合的教师群体，打造开放联通、经验互鉴的教研平台，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两年来，虚拟教研室的建设成效显著，依托全国 282 所高校，辐射带动 1700 余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企业等，建设虚拟教研室 787 个，参与成员超过 7 万人，建设 4.9 万余项教学资源，共享近 7.5 万份教研资料。同时，构建虚拟教研室信息平台，支持教师开展跨地域、高频次、实时性教研交流，通过名师带动一线教师开展各类教研活动约 3.5 万场，参与人数达 93.4 万人次。此外，虚拟教研室探索技术与教研深度融合，推动教研模式创新。如运用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构筑“线下直通线上、在线如同在场”的教研空间。

（二）内容为本：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位，已上线慕课超过 7.68 万门，服务国内 12.77 亿人次学习。作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三横三纵”资源服务格局中的重要一“横”，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汇聚 2.7 万门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以及 6.5 万余件教材、视频等各类学习资源，用户覆盖 166 个国家和地区，资源覆盖 13 个学科 92 个专业类，开设课程、教材、虚仿实验、教师教研等栏目，设立思政课、院士讲堂、红色筑梦之旅、大学书记校长大课堂等专题资源，并设置“慕课西部行”专栏。其中，慕课板块能够“一站搜索全网好课”，虚拟仿真实验板块实现“网上做实验”和“虚拟做真实验”，平台已成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课内外教育横向联通、本研教育纵向贯通、覆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综合资源服务平台。依托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创课”平台，设置创业理论、创业模拟、创业实践、创业支持 4 个模块，创业理论模块上线 450

多门慕课和微课，创业模拟板块开设创业活动虚拟仿真实验，创业实践板块提供创新创业大赛实况和路演视频，创业支持板块汇聚全国 100 家国家级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简介及联系方式。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在线开放课程等数字教育资源管理。开展三批次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遴选，遴选范围包括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社会实践五类，遴选标准重点关注开发适宜的课程内容以及提供优质、开放、共享的教学服务。印发《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就教师管理、学生在线学习规范与考试纪律、课程平台自我监督机制、课程平台监管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出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试行）》《智慧教育平台 数字教育资源技术要求》，加强国家平台数字教育资源质量管理，研制数字教育资源入库出库管理规范，开展平台内容安全专项排查，以保障各级各类平台资源优质、内容可靠。

（三）合作为要：国内国际合作深化务实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通过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2013 年，教育部启动“慕课西部行计划”，精准对接西部高校教与学需求，通过有组织的慕课供给、师资培训和教学平台服务，分享东部地区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西部高校教学水平。十年来，“慕课西部行计划”将东部地区高校的大批名师名课等优质资源持续输送至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极大拓宽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据统计，东部地区高校累计面向中西部高校提供了 19.8 万门慕课及在线课程服务，帮助中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506.9 万门次，参与学习学生达 5.4 亿人次，西部高校教师接受慕课培训达 189.3 万人次，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验空间”覆盖 682 所中西部高校。中西部高校课堂中涌现出一批新颖的教学模式，如异地同步课堂、融合式协同教学、在线远程实验等。其中，依托国家平台发展的“1+M+N”模式，由一所高校带 M 所高校、N 个课堂，实现资源共享和学分互认。持续开展中西部高校大规模师资培训，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数字化教学能力。以

慕课“小课堂”为切入点，在中西部高校掀起一场“课堂革命”，有力推动中西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解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通过构建“大学（U）- 政府（G）- 企业（B）- 学院（S）”合作机制，持续推进跨校合作办学、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教育部直属的13所原“211工程”建设高校组成了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优质资源共享联盟，通过精品课共享、学生互派交流、学分互认等方式实现互利共赢。教育部与华为联合发起“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项目，并于2023年9月正式启动“智能基座2.0”，联接校企主体、联接教学要素、联接时空，通过联合培养数智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华中师范大学联同宁夏教育部门共建华中师范大学宁夏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为宁夏“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学术引领、人才保障、教学服务与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举办“院士大讲堂”“科学家精神大讲堂”，通过线上线下混合的活动形式，让广大学习者收获更多知识、领悟科研精神，推进科教融汇。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强化与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组织合作，上线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整合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等社会资源，为大学生非正式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我国在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实施“数字教育出海”，让中国慕课走出国门，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建设了“爱课程”和“学堂在线”两个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向全世界大学生和学习者提供了包含14个语种的1000余门在线课程。为亚洲、非洲地区高校无偿捐赠软硬件设备并提供技术支持，为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的伙伴院校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国际课程、教材建设，辅助轨道交通、能源化工、健康医疗等领域的人才培养。2020年，在教育部倡导下，清华大学牵头成立了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这是由我国发起并主导的首个高等教育数字化领域多边国际组织，成员包括16个国家的17所知名大学与6家在线教育机构，2023年新加入英国FutureLearn平台、印度尼西亚网络教育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3个成员。自联盟成立以来，已举办4届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其中2023年首次走出国门在意大利举办，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开设341门次全球融合式课程，推出10个全球融合式证书项目，服务2540万人次学习，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全

球 30 余家知名高校和在线教育机构合作搭建课程引进与输出的双向渠道，组织 88 所国内大学为印度尼西亚提供近 300 门高水平慕课并覆盖 3000 多所高校；连续两年发布《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和《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为世界各国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提供经验借鉴和数据支撑。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教育部协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技术协会等国际组织，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支持中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联合国 6 种官方语言，设置资讯专栏、资源服务、政务大厅三大板块，其中资源服务板块首批上线约 780 门课程。

二、“3I”引领：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演进，ChatGPT、Sora、人形机器人等应用愈发成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预示着社会生产力即将迎来新一轮质的飞跃。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呈双螺旋上升趋势，共同引领经济发展方式重构，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教育作为培养未来人才的重要途径，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通过数字化转型着力培养价值为先、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创新人才，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创新发展。

历经两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我国数字教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我国教育数字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从局部转型到全面转型乃至全局变革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科技革命和教育变革交织的历史关口，教育部对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作出重要决策部署，提出以“3C”为基础，以“3I”为指引，坚持应用为王，实现中国数字教育的高质量、全球化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时代发展的引领者、时代变革的先行者，需要牢牢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积极行动，加速高等教育系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实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跨越式创新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以响应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切口，围绕“3I”发展道路开展先导性实践探索，大胆尝试以数字化重塑校园新生态，争做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试验田”，为纵深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2022年5月，武汉理工大学适应数字时代要求主动求变，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部署实施以信息化为战略引擎的“5·30”行动计划，以“深入实施数字化战略行动 全面赋能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人才培养与招生就业改革，打造以“重构新标准、注入新动能、创建新模式、打造新体系、培育新文化”为内涵的“五新”计划，实施以“数字赋能行动、措施引导行动、管理保障行动”为核心的“30条”行动，培养智能时代的拔尖人才和卓越工程师。“5·30”行动计划的全面推进，为高等教育数字化“3I”落地创设优质环境和良好条件。

（一）集成化：更高质量汇聚数据资源，塑造高等教育发展新优势

集成化是指进一步强化优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扩大应用间的数据交换和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整合，构建资源体系、目录体系、数据体系、应用体系。武汉理工大学大力推进综合化、一体化校园平台建设，通过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技术推动实现资源、数据集成化管理，努力为优质资源流通提供畅通渠道，为教育教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提升办学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平台集成方面，建成数据中台并发布服务指南，无缝对接校内平台和校外平台，集成教学平台、管理平台、服务平台、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第三方学科平台等141个平台，逐步实现跨应用的业务流程整合与拓展。

资源集成方面，建成数字化资源中心平台，打造“理工智课”平台，目前已建设超1.9万课程空间、58万个课程资源、1300余门数字化课程，提供常态化课堂的实时教学视频资源的汇聚存储、管理及应用，实现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虚拟课堂无缝融合，满足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MOOC、SPOC、碎片化学习等多种应用场景。同时，兼顾核心AI能力平台的本地化搭建，向学校其他周边系统提供能力及资源输出服务，将优慕课平台、中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平台、融媒体平台的教学资源接入学校系统，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课程近100门，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优质课程126门。开设智能建造、智能系统

技术、智能汽车技术、光电子信息玻璃、碳经济与碳数字化等 14 个微专业，深化产教融合，实现跨界、跨学科培养专业人才。

数据集成方面，组建数据治理工作专班，围绕数据驱动“一条主线”，聚焦应用、数据“两个架构”，梳理服务、系统、数据“3个目录”，形成业务信息化清单、服务事项清单、业务数据化清单、电子资源清单“4张清单”，建立“1234”数据治理体系，加快推动“热数据”供给，持续提升数据交换能力。按照上下贯通、协同共享的原则，一体化构建校长、处长、院长“3层链接”数据驾驶舱。围绕学生、学科、教学、科研、人才等重点领域，汇聚 106 个关键指标形成综合校情“十大指数”建设“校长驾驶舱”。聚焦规划、监管、评估、服务四大职能，选取核心业务域的关键指标项建设“处长驾驶舱”。梳理 2700 余个数据项建设“院长驾驶舱”，打通教学科研单位数据驱动全链条。

（二）智能化：更高效能应用智能技术，开辟高等教育发展新空间

智能化是指促进智能技术与高等教育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助教、智能助学、智能助管、智能助评、智能助研，通过构建人在回路的智能教育，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赋能。武汉理工大学积极推进智能技术充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构建“师 - 生 - 智”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教师利用智能技术创新教学活动，强调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构建数据驱动的管理体制，打造能力为重的全过程智能评价，探索智能技术支撑的科研模式，构筑人机共生、数智融合的校园新生态。

智能助教方面，全力推动智能技术再造学科教学，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突破教与学边界，打造“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等情境化教学场景，提供数字化创新创业体验、光纤传感网络体验、船舶远程驾驶体验等 7 个沉浸式体验场景。开设校企共建特色专业课程，与相关行业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与定制班级。“理工智课”平台正结合 ChatGPT 等产品，联合百度、科大讯飞等企业，推进大模型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基于大模型自主开发教学资源工具、辅助探究教师教学基本规律，助力形成大模型教育应用标准规范。

智能助学方面，依托智能技术构建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有机融合的“双空间”育人新格局，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自主学习研究，确保“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借助数字孪生等技术，学校和湖北民族大学跨校合作办学，实现两校学生在不同地域一起进行仿真操作，远程控制机器人共同完成实验项目。

智能助管方面，借助智能运行中心的调度驾驶舱实现精准化扁平化管理，上线“AI校长助理”，创新实施“红绿灯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及时提醒任务推进落实进程，显示既定目标达成与偏离情况，实现学校事业发展态势一屏统览和一键调度。同时，开发AI巡课系统，自动化分析课堂教学质量并辅助教师改进；实现“一站式、不填表、零跑路、免证明”等常规式服务。

智能助评方面，构建数据驱动的质量保障体系，绘制学院、学科、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多元数字画像。依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数据驾驶舱，建设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全程线上不入校”可行性试点，实现“无感式”教学评估。智能助研方面，学校打造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襄阳示范区配备智慧教室、实验室及智能化科研设施，并与10余家共建单位，成立湖北隆中实验室，组建了由院士等国家高层次人才组成的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聚焦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领域转型升级，并将研发的新型材料与信息产业融合，通过“材料+信息”转型策略推动产业数字化。面向智能交通、网联汽车等领域寻求技术突破，并围绕数字人文、数字伦理开展研究探索，不断为传统优势学科注入发展动能。

（三）国际化：更高水平开展国际合作，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国际化是指深化数字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凝聚教育数字化发展国际共识和标准规范，面向全球学习者提供公益性学习指导和支持服务，加强同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数字化领域的互容、互通、互鉴，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武汉理工大学正积极探索国际化发展路径和推进策略，依托国家平台向全球各国共享课程资源，开展跨国人才培养和跨国科学研究，提升学校教育数字化国际影响力，为“数字教育出海”献智献策。

目前，学校上线 19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全球学习者可在中国大学慕课、爱课程等平台在线免费学习；探索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深化国际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跨国联合培养高技能、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重要国际论坛，向世界各国宣传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 and 行动方案。未来，学校将贯彻落实国际化发展理念，把国际交流合作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方向，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数字化合作联盟建设，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推动学校优质资源向全球开放共享，响应国家号召加强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校教育数字化建设帮扶，打造高等教育数字化国际典范；围绕“AI for Science”“AI for Engineering”“AI for Technology”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交通等重点领域，构建国际研究合作网络，深化国际产学研协同育人，联合世界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探索建设全球研究中心。

三、全局变革：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前景展望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未来已来。面向未来，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生态的变革作用，通过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升级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发展类型多样的教育大模型，全方位推进高等教育的“人工智能+”行动，加快教、学、管、评、研的系统性变革，实现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范式再造，构建绿色、创新、协调、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教育数字化蕴藏无限潜能。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应争做教育变革的引领者、先行者和创造者，携手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共同打造更加以学习者为中心，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高等教育新生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支撑引领教育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社会进步基石。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

2024年5月,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所撰写的《教育竞争力研究:为何、何为、如何》一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论点摘编,文章原刊于《教育导刊》2024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封面

CHINESE SOCIAL SCIENCE DIGEST	
从具身到离身看人的同一性.....	刘红玉 董一纯(152)
论孟子哲学中的“听”.....	伍尧(152)
节奏的三重向度:形式、经验与内在性.....	高楠(153)
当下中国城市传记写作热的观察与思考.....	赵源 刘川鄂(153)
“自然”在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创作中的多重意义.....	金衡山(153)
论非遗传承问题的拓展.....	马加迪 常国权(153)
明代乡会试选时务策考论.....	陈晨 马子木(154)
清朝中央御院画诺乱穿.....	陈刚 崔少华(154)
清代人参与集范围反映社会变迁.....	陈一航(154)
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李春志(154)
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与城市规划的兴起和发展.....	刘峰(155)
财政利益、统一大市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谢良成等(155)
大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孙赫卿(155)
企业全球研发网络的治理新机制.....	唐磊 刘伟(155)
提升乡村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	徐琴(156)
城乡空间融合应以公平性为目标.....	梁其平(156)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相吻合.....	王新权(156)
生态文明视野下空间治理的三重目标.....	杜辉 杨景晖(157)
人工智能:一项战略性技术的应用及治理.....	曹伟颖(157)
“边缘国家”何以成功塑造国际规范.....	董青青(157)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机制.....	陈兵 杨恩宇(157)
注重对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协作的监管.....	郑维方 方世荣(158)
还原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性质.....	刘力(158)
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	王煦(158)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农户增收.....	郭兆峰 宋洪涛(159)
破解大学生就业社会适应困境.....	梅克 王玉香(159)
推进教育竞争力研究.....	周洪宇(159)
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实现路径.....	王定华(159)
精神疾病的文化解读.....	帕图北提·朱舍塔尔等(160)
推广普通话与国家治理.....	刘余林等(160)
体认语言学与心智哲学语言研究.....	廖巧芸 薛磊(160)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转载目录·局部

论点如下: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作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新使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意味着提升教育竞争力作为建设教

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和有效路径承载了新的内涵。如何将提升教育竞争力这一宏伟目标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工作任务，从而判断其发展水平，如何从本国各地区不同的资源条件、经济历史文化基础和空间区位的角度出发，科学监测与系统评价教育竞争力的发展水平，从中寻求破解中国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路径，是当前教育竞争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面临的课题。教育竞争力研究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教育竞争力，将之作为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竞争力与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加以考察，从区域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出发，探讨提升教育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解决地方教育发展矛盾的有效方法，将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教育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分析框架。

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权威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选登论文代表了各领域的前沿思想与学术精华，被国内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认定为权威学术期刊，是目前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成果收录标杆。此次周洪宇院长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不仅意味着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体现了我院在学术前沿与教育政策理论方面具有深远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我院院长出席“乡村振兴和教育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6月7号下午，“沪滇同康”暨“乡村振兴和教育发展”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本部举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兼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联合会会长孙建平、副会长兼医疗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朱同玉等出席会议。

本次活动由联合会、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指导，思源·能量公益基金、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研究院、人民能量等单位共同主办。

周洪宇院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特别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为贯彻这一重要理念，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积极行动，与人民能量公益发展中心紧密合作，将教育资源重点投向乡村学校，通过实施“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创新教育模式，并融合“认

知教学与实践教学”，致力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他希望通过联合会、上海交通大学捐赠的技能培训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指导的心理健康援助项目，为乡村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和坚实保障。



孙建平会长在致辞中强调，联合会持续关注沪滇协作地区发展，并将公益援助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过去一年，联合会与多家机构携手，成功在红河州培育 1627 名合格“健康管理师”，为当地医疗领域注入新活力。目前，联合会已与红河州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多个领域，共同推进沿边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今年，联合会捐赠了小学生心理健康双师课堂项目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支持当地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联合会将继续深化协作，助力沪滇协作地区繁荣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会前，孙建平会长会见了周洪宇院长，就双方未来合作进行深入的交流。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宇、叶盛，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刘来兵教授及其他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院校专家教授，上海市金山区和云南省普洱市委办局领导，联合会医疗服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元良，以及沪上企业家等共计四十余人参加会议。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依托“生活实践”教育改革试验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积极开展“新时代小先生”“新时代大先生”“新时代未来大先生”三大行动。今年年初，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响应国家乡村教育政策的、回应人民诉求、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规律，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决定建设成立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研究院。此次系列公益活动的启动和开展，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乡村振兴与教育发展研究院发挥积极作用，为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为教育均衡发展做出探索和贡献的重要举措。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